

毛泽东与长征



作者：通吃岛岛主

知乎 ID：通吃岛岛主

微信公众号：通吃岛

前言

史料记载：

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明送一位女士回家，然后离开了。

某历史学家解读：小明对该女士意图不轨。

问：小明啥也没干就离开了啊？

该历史学家解释：那是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意图不轨而犯罪未遂。

后来更多史料披露，原来那位女士是个 80 岁老奶奶。

该历史学家解释：小明本人有心理变态，专攻老太太。

能说通吗？能说通。

逻辑有问题吗？没问题。

引用史料了吗？引用了，绝对的原文解读。

但是，大家会信服吗？

我想大多数心智健全的人一定会说，该历史学家才心理有问题，八成和小明有仇，先假定他是坏人，然后以此为逻辑解释史料。

其实以上内容并非虚构，以高华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正在干这些事，但仅仅由于描述的对象不是王小明而是张麻子，所以竟然被冠以“揭开真相”“良心学者”“不畏强权”之类的名号。

关于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李晓鹏博士的文章已经驳斥得非常完美了：

这个传言就是说毛泽东这个人，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折手段，搞党内斗争的时候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这一类传言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高华的那本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的就是说在延安整风当中，毛泽东以这个很阴暗的心里、用了很多很不光明的手段来整人。作者高华在书里边说：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作者就列举了很多证据。比如，延安整风结束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说：你们看，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大权在握，七大的人事安排就体现了毛泽东要独揽大权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仔细一看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单，好像高华说的不完全对嘛。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还在中央委员会里边，还是中央委员，没有被迫害啊。于是《红太阳》的作者就说，这些人已经被剥夺了实权了，只是挂一个

空头的名额，其实是被整了。这个说的呢，有点道理。

我们再一看，诶，那延安整风里边表现最积极、被作者认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康生，他的社会部部长的职位被撤销了，没有保留任何实际职位，就是一个空头委员，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作者又说，这是因为康生整风得罪的人太多，毛泽东不得不把他拿下来，显示康生干的坏事与自己无关，这叫丢车保帅。

然后，再来看中央委员里边被提拔的人，刘少奇、彭真这些人被提拔上来了。作者就说，你看，这就是毛泽东重用私人，把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大力提拔了。这是任人唯亲。这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一看，咦，周恩来也被提拔上来了？周恩来可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而是威望很高的中共元老，以前还当过毛泽东的领导，当了好多年，在井冈山把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博古王明那一边的。就在一年前，周恩来还跟王明一起在南方局搞统一战线，合作的还挺好。那这又怎么解释呢？这个《红太阳》的作者又说啊，这是因为毛泽东需要显示自己的公正、宽大。为了掩盖自己的权力野心，故意树的这么一个典型。

这样的解释，我认为就有点牵强了。客观的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对历史细节的考证，非常的详实，不是凭空造谣。这书里面说的事情，基本都是真的，但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他去解释这些事情，所用的逻辑有问题。

实际上他举的这些个例子，我们用相反的立场和逻辑来解释，也完全解释的通。

我们完全可以说，王明、博古这些整风的主要对象被批判了以后，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这说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周恩来这样的人呢，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说明毛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还是心胸宽广。反之，像康生这样的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犯了很大的错误、制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坚决拿下。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人公正无私，不姑息养奸，不包庇纵容自己的亲信。

你看，我们这样来分析，也是通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事情是同样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逻辑去分析，就可以得到两种相反的意见。

（作者还有更具体的分析，有兴趣可以看全文《澄清谣诼，还清白于毛泽东》）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也是看高华的这类著作长大的一一人嘛，天生就有猎奇心理，否则为什么宫斗剧会那么火？

但是后来越想越不对，照这些书中的讲法，party 经常搞运动，每次运动就是毛为了整人、巩固权力，每次都是正直的好人蒙冤，无耻的鼠辈上位。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天天整人的组织反而凝聚力战斗力越来越强？不仅击败了国民党，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击败美军？

事实上，许多历史爱好者甚至知名专家学者常常是这样的：每当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共济会”等等坊间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的时候，就会嗤之以鼻极尽讽刺嘲笑——的确，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深知这个世界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某家族某组织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将其完全操控。

然而，一说到党史，自诩理性客观受到高等教育出入上流社会的专家们不见了，对于任何事件的解释都是清一色的阴谋论，而代替“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位置的，正是张麻子。

这个惊天的阴谋持续时间极长。最晚从秋收起义就开始，最早可能推演到他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它由无数个小的阴谋组成，从古田会议 AB 团，到遵义会议会理会议，到抗日战争延安整风……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甚至到 1976 年 9 月 9 日张麻子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动作，都是阴谋的组成部分。

这个惊天的阴谋受害者人数众多范围极广。博古李德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张国焘刘志丹彭德怀刘少奇等等你听说过没听说过的党内人士，十大元帅十大将，文艺工作者经济工作者，都深陷阴谋为其操控。

不仅仅是党内人士。善良正直的民族魂常公凯申，多好的人呐，一心抗日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正是屡次受到其阴谋的欺骗和操控，才最终忍痛退到台湾，中华民族从此一蹶不振。

不仅仅是中国人。淳朴的赫鲁晓夫、高傲的麦克阿瑟、无私的杜鲁门、勇敢的艾森豪威尔，只要和他交过手的，无一不深陷阴谋不能自拔。

不仅仅是高层人士。他的警卫员、秘书、医生全部为其阴谋操控，就连我奶奶的姑妈、舅舅的外婆、婶婶的大舅子，还有各种叔叔伯伯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他阴谋中的一个棋子。

哎，这么看，世界上全都是好人，只有张麻子一个坏蛋，如果没有他，大家早就过上皿煮滋油不劳而获的幸福生活了。

都怪张麻子！

这是双标么？明显是的。是故意这么做的么？有可能。但我更愿意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是思维的问题。

历史是个整体，也是个连续的过程，然而许多爱好者甚至专家学者在研究时常常把具体的事件从特定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这样根本无法弄清事件发展的真实逻辑，最终只能依靠预设立场强行解释。比如高华等人也写过一些有关长征的文章，通篇都是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后只能用阴谋论强行串到一起。

当然，既然有“阴谋论”就有他的对立面“天才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出于对

某些现实的不满和对领袖的热爱，把老毛描述成了神一般的人物，仿佛从出娘胎起就展现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党内外国内外的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永远是一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样子。

这种天才论其实就是阴谋论的另一种表达，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结果。

我希望能够为还原真实的历史做一点贡献，因此开始了这段写作。在本书中大家会看到，遵义会议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然的转折，早在渡湘江之前就开始了铺垫；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军事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甚至被再次免职，等等；大家还会看到，毛泽东为什么总是反对其他人，他是怎样思考问题的，博古李德等领导人所做出的后世看来荒谬可笑的决策在当时有怎样的合理性，等等。以及，最有意思的，毛泽东是如何由一个到处得罪人的耿直青年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逐渐懂得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开始。

目录

前言..... 1

长征前传..... 1

 毛泽东被迫“养病”..... 2

 赣州战败与毛的复出..... 4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迫“养病”..... 9

 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抗命而转败为胜..... 14

 朱德与李德..... 16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18

 “图上作业的指挥家”..... 20

遵义会议..... 26

 湘南争论——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27

 血染湘江..... 29

 遵义序曲——通道、黎平、猴场与乌江..... 30

 遵义会议——毛泽东真的确立领导地位了么？..... 34

 股票大作手毛泽东——遵义会议问题总评..... 38

四渡赤水..... 42

 忆秦娥 娄山关..... 43

 毛泽东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撤职..... 46

 三渡赤水，密码破译对红军到底有多大帮助？..... 48

 演员的自我修养——四渡赤水与兵临贵阳..... 51

跳出重围..... 55

 金沙江——“巧渡”还是“险渡”？..... 56

 会理会议——毛泽东与林彪“弓背”“弓弦”之争..... 61

 跋山涉水来看你——从彝海结盟到强渡大渡河..... 64

 翻译翻译什么叫“信仰”——飞夺泸定桥与翻越夹金山..... 68

长征终章..... 74

 从两河口到芦花——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初次交锋..... 75

 为了团结——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再次交锋..... 79

 尖峰时刻——长征最后两月的斗争..... 84

长征前传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红军被迫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要想了解更深层的原因，必须到三四次反“围剿”之间那一年多的“和平”时期去找。这期间，毛泽东被反复批斗，离开权力核心；朱德竟也被排挤出最高决策层，这在战争年间还是唯一一次；上海来的项英、博古等人成为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一年里，红军放弃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反而主动出击，对国统区大城市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这才是后来反“围剿”失败，乃至被迫长征最深层的原因。

而作为我们故事主角的毛泽东，此时还是一位耿直 boy，由于想法总是与众不同，他每次开会的日常发言就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遭至山沟派上海派海归派高层的一致反感，多次被踢出决策层。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这一年多里发生的事。

毛泽东被迫“养病”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以胜利告终，作为领导者的老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喜悦，反倒有种不好的预感。

9月的时候上海中央曾给朱毛电报，说第三次反“围剿”也马上胜利了，你们要赶紧打一两个中心城市，不能光在农村晃悠了，并且提出，目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好像就是在说毛，因为他多次强调要把富农和地主分开对待，要团结富农，而且阶级划分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把一些中农强行划分成富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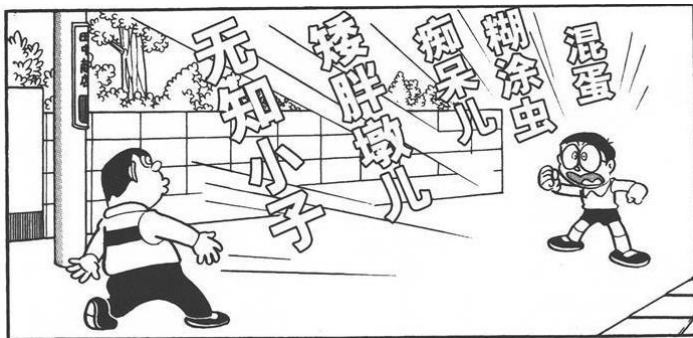
与一般印象不同，当时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朱毛了，而是项英。早在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项英就受王明钦点，从上海来到江西领导根据地，王明当时则是受共产国际钦点，从莫斯科来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到达江西后，项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原来的总前委，重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朱毛任副手。本来这个决策要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落实，没成想蒋介石紧接着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根本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朱毛也因此一直待在前线，没有回瑞金中央。由于战争形势紧急，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人事变动，所以实际的军事指挥仍由朱毛掌握。

11月1日，朱毛刚刚从前线回到中央不久，项英即主持了著名的“赣南会议”。会前老毛没太多想，虽然由于理念不同受到了上海中央的批评，可毕竟这块最大的根据地是他首先建立的，又和老朱一起指挥了三次反“围剿”，怎么说也是功大于过吧。

他真想错了。

赣南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忽视阵地战”“狭隘的经验论”……简直集所有右倾机会主义特征为一身。



紧接着，11月内，首先将毛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后组建了新的军委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是15个委员之一，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由军委会直接领导，撤销原来的总司令总政委职务（毛就是总政委）。



大家都看明白了吧，给老毛挂了一个听起来霸气却并无实权的空职，而后踢出了最高军事决策层。



赣南会议

12月，周恩来从上海回到瑞金。他带回了中央的指令——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今后的总方针，最短时间内占领南昌等大城市，将东南苏区连成一片，然后向全国进攻。周也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熟悉工作期间暂由毛泽东代理），成为苏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而后，上海中央多次要求一方面军首先夺取赣州，再顺赣江而下最终夺取南昌，解放江西省。于是周恩来准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攻打中心城市问题。

周和项英不同，他觉得江西这边的军事活动一直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定比自己这个空降者更熟悉实际情况，因此会前他先去征求老毛的意见。

毛明确说，红军缺少攻坚战武器，绝不能攻打中心城市。

周恩来听从意见向上海汇报，提出攻打中央城市有困难。

上海回复，必须攻打中心城市，如果不打南昌就在抚州、吉安、赣州之间选一个。

没办法，会议召开，讨论主题是先打哪个中心城市。项英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打赣州。

毛反对。

原因有二：首先赣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时曾围攻三天而不能克被迫撤退；第二，国民党军在赣州附近屯有重兵，一旦久攻不克必然深陷重围。

除朱德外，其他人不同意毛的看法，他们认为红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红军了，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装备、士气已有很大提升，而且一旦攻占赣州即可攻打南昌进而解放全江西。

好，少数服从多数，“打赣州”已经决定，讨论怎么打。

毛提议，如果一定要攻打赣州，就用围城打援的方法，佯攻赣州，首先逐个歼灭来援之敌避免腹背受敌，随后相机夺取赣州。

其他人都不同意，认为那样速度太慢，应当趁敌人没有防备立即攻打，速战速决。

老毛实在没办法，说，我们与会的大多数都在后方，可能不大了解前线情况，在

做出决策前能否把前线指挥员找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项英回答，时间紧急，不必现找，他曾经问过前线的彭德怀，彭说，赣州总兵力不足 1 万人，若无援军可以打下。

都到这个份上了，毛也无话可说，攻打赣州就这么决定下来了，彭德怀任总指挥。

几天后又发生一个插曲。中央局会议上，毛作为代理书记主持会议。谈到“九一八”后中国的形势时，他认为日军下一步一定是全面侵华，是时整个国内的矛盾要发生大变化，应当予以重视进行分析。没想到从上海来的那批人竟然依此又批判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说日军侵占东北主要是为了攻打苏联而并不是侵华，你分析九一八竟然不提“武装保卫苏联”，妥妥的右倾。

老毛简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会议不得不更换主持人。会后，他被迫去东华山的庙里“养病”。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许多高层领导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讲话又冲。前三次反“围剿”就是如此，毛开会时总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每次决策总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还好朱总一直很支持他，凭借朱的威望和连战连捷的战况，毛才一直进行军事指挥工作。

赣州战败与毛的复出

赣州战役打响了。

红军首先组织 10 人一组，云梯攻城。由于敌人炮火太猛，失败。

而后，坑道爆破攻城，由于炸药质量太差，失败。

彭德怀、黄克诚等向中央汇报，表示攻城希望很小，要求撤军。结果中央不仅不准，还要求总攻。

红军缺少重武器，攻击接连失败，伤亡巨大。

不久，敌军 3 个师援军赶到，城内守敌出击对红军前后夹击。无奈之下，红军撤出战斗，共伤亡 3000 余人，400 余人被俘。

但是危机并未解除，前线红军仍在



赣州战役时搬运云梯、炸药的红军战士



包围圈之中，随时会被吃掉。

无奈之下，项英亲自跑到东华山，告诉“养病”的老毛前线战况，请他回去参与决策，重点是解前线红军之围。

毛当即下山，给前线指挥部拍一个紧急电报，建议启用红五军团（这是第三次反“围剿”后投诚的国民党军改编的，当时还没敢直接用），以此去解围。朱德当即采用，红三军团成功突围。

到达前线后，老毛立刻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与下一步方针问题，中央同意。

会上，大多数人仍坚持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因为这是执行党中央（也就是上海）的决议，而且打下大城市可以扩大影响进而先获得江西一省的独立。

毛实名反对，他认为红军应实行“出击求巩固”方针，也就是说不打江西中心大城市，而从边界开始向东、向南发展，因为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

毛的提议被否决，基本没人支持。中央作出决议，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分成东路、西路两军夹赣江而下，向北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和毛提出的完全相反。

随后毛被分到东路军随军作战，但是没有军事职务。还好，东路由 1、5 两个军团组成，其中 1 路军总指挥是林彪，政委聂荣臻，都是老朋友，有的商量。

于是，毛立刻向林、聂建议，改变路线，向东进入闽西作战。他做出了许多分析，认为红军应该避实击虚而不是主动进攻敌人力量强的北方，而且红军是“以战养战”，此时物资不足，必须打一些胜仗进行补充。最后林聂二人赞同他的分析，并将此报告给中央局，提议改变东路军原定行军路线。

周恩来当即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最终同意建议。

东路军于是改变方向，东进福建，攻占龙岩，缴获大量物资。

毛此时继续对情报进行分析思考，认为闽南地区敌军防守空虚，尤其是漳州，城大人少、地形有利、易攻难守。更重要的是，如果停留在龙岩附近会受制于敌，而南下漳州却可以调动敌人，打开局面，方便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我们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就会发现，他特别强调战争中主动权的掌握，一定要把敌人带到自己的节奏中来）。

老毛知道，中央真正可能支持他的就是周恩来了，于是他直接给周发电报，陈述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周同意。



于是，东路军在毛的实际指挥下，一天就攻下了漳州，俘虏 1600 余人，缴获颇丰，甚至有两架飞机。

与此同时，却是西路军的屡战屡败，他们在湘南遭到湖南、广东两地军队的合围，被迫撤回赣南。

可是，东路军的胜利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上海中央不断发电报到江西苏区进行批判，说军队怎么一直在福建的农村和小城市打转，迟迟不进攻中心城市，很明显没有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仍然没有解决**对革命盲目悲观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6 月初，老毛随军回到赣南，7 月中旬，周恩来由苏区中央来到军队前线主持工作。不久就向中央局发出电报：“应尽量发挥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负责，对指挥打仗更有利”，并建议恢复毛的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中央局（任弼时、项英）不同意，他们坚持要周恩来兼任政委。

周一反常态，坚持己见反复建议（他一般是斡旋者，很少这么坚持），让毛担任政委。

8 月上旬，中央终于同意，恢复毛的总政委职务，同时建立一方面军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线军事决策，其中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为成员。

（插一句话，周总理对党真的是太太太重要了，他就像一个粘合剂，温和却又无比坚定，善于斡旋使他 50 年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公而忘私鞠躬尽瘁地维护着这个组织始终向前。如果没有他，真的不敢想象）

随后的中央局会议讨论一方面军之后的行动方向。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最终采用了毛泽东的建议（朱、周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思路大概是这样，迅速出击拿下乐安、宜黄二城，而后逐个击破来援之敌。

结果，七天之内攻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灭国民党 27 师，俘虏 5000 多人，缴获无数。对了，大部分战斗，朱毛二人都是亲自在前线指挥。

随后一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向南城进发，却发现此时南城已经重兵集结且防御坚固，于是立即改变计划，将军队散至南城周围深化建设根据地，休整、宣传、筹款。此时，周毛朱王商议的新计划是围点打援，红军在此附近休整，一旦陈诚等部援军到达范围就立刻集中兵力予以歼灭。

周恩来将此计划汇报给中央，中央不同意。中央局认为，一方面军应当返回乐安、宜黄方向，主动攻击陈诚部的援军。

中央局这么命令当然有他们的分析，首先是陈诚部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可以迎头痛击；更重要的是，陈诚部的移动给苏区中央的根据地造成了一定威胁，不利于根据地的稳定。

四人讨论以后接受了命令，依此进行移动。

然而敌军的行动很快，其他部的援军很快已经逼近红军，一方面军被东西夹击，近乎被包围。

在此危险的战况下，老毛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作为红一军的先头部队，在前线对敌军军情进行打探与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建议发给后方大部队中的周朱王三人，诸如敌军现在何处、可能向什么方向活动、我方最好在哪里集结、如何回应等等，并且提出，长时间的作战与跋涉使得我军十分疲劳，应当有 2 天以上时间休息。

后方部队依次成功避开敌军，聚集于东韶、洛口一带，进行休息。周恩来随即给中央拍电报汇报近来战况与之后打算，没想到却遭到中央局的批评。

中央局认为，他们应该速速进行战斗消灭援军而不是停下休整，因为他们的停顿使得敌军更加逼近中央，对当地群众造成很坏的影响。中央要求他们西进攻打永丰，以将敌人西调。

他们四人不同意，原因两点

- ①红军已经十分疲惫，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需要休养 7 天以上
- ②敌人本来的目的就是引我们西进，早在路上布好防守，攻击难度太大。他们的思路是，一方面军不与敌人正面作战，而要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扩大建设根据地。

而后，前线朱毛周王四人与中央以项英为首的领导们通过电报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极为激烈的论战，这在党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中央认为此时敌各部分援军尚处在分别进军的状态，一方面军应当趁此机会逐个击破。四人小组（其实主要是毛）不同意。

各位可能疑惑了，集中兵力逐个击破这个方针毛主席不是一直强调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同意了？我就简单讲一下毛主席在这方面的军事思想。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常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生产能力低下，物资主要靠缴获。所谓“伤”就是指击溃敌军，“断”就是指歼灭敌军。击溃敌军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敌人撤走，缴获非常少，对于红军而言可就是损失了大量的弹药粮食而得不到补充，相反，敌军有大量的工厂土地，只要建制没有被摧毁，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恢复。因此，毛主席一直在军中反复强调，“击溃”对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而言是败仗，这种战斗是要避免的，发生以后是

要反思的，我们需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另外，毛主席还强调在战略上要持久战，战术上要速决战，这也是因为一旦战斗拖得时间长，敌人的援军就会到来，导致无法歼灭敌军。（具体的战争理论请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比《论持久战》更精彩）

好了，现在可以解释毛反对的原因了。他认为，各个击破是对的，但是目前敌军每一路的实力都很强而且处于据点，以红军目前的实力应该可以将其打败但是肯定无法歼灭，另外这些战斗短时间内难以结束，势必会引起援军到来，对红军更是不利。毛认为，在敌人据守的这些城市附近发展建设根据地并开展游击运动可以“引起敌情改变”，引敌军分兵出城，那时候再予以歼灭。

中央反对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四人没有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缺乏战略性。建设根据地开展游击运动的确可以增加取胜的把握，但是至少要使战斗向后延迟1月以上，这会给其他部队造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对于同时期其他红军部队进行的战斗十分不利，对整体的军事行动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听起来也没问题，可是老毛心想，你们这群人啊，naive！你们所谓的那个“全局”太小了，只考虑眼前的直接的问题而从来不会看到一月后一年后乃至更久远的问题（当然这个没写进电报里）。

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正在谋划一场更大的军事计划（也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我们需要的是为这件事做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出了很多险招，为什么？红军的战略就是诱敌深入，而后在运动中找到敌军弱点予以击破。当时根据地面积太小，一些地方建设也不够，导致红军可运动的范围不足，回旋余地小，因此才走了很多险棋。马上开始的第四次“围剿”一定比第三次更加猛烈，所以我们必须要扩大、建设根据地以为将来的军事行动争取更大的空间，这远远比短期内支援友军要重要得多。

其实这个分歧由来已久，根本上说是“上海派”“国际派”和朱毛这样的“山沟派”的思想冲突。让我们把时间回到文章开始——

国民党一、二次“围剿”之间的间隔很短，这是毛早就预料到的，本来计划应当是这之后抓紧开展根据地建设，但蒋介石脖子上顶的也不是个灯泡，他出其不意，几乎没有停顿就展开了第三次“围剿”，这确实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在筹款、征兵过程中出现了左倾的苗头，好在第三次反“围剿”顺利取胜，此时的蒋介石无力对苏区进行新一轮的“围剿”（这段时间光顾着红军了，其他地方都乱了），这正好给了苏维埃政府一个建设的好机会。

于是，第三次“围剿”刚结束毛就给上海中央拍电报，汇报当前苏区经济工作的成果和问题，并且提出要迅速建设根据地的一些主张。但立刻被驳回，上海让他们赶紧乘胜进攻大城市，解放全江西。

毛一直以来就在批评红军中普遍存在的单纯的军事观点，他一直强调军事行动和



建设行动要并重，一方面军事行动的成功可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的开展也会更好地支持军事行动的展开。可是上海那边却批判他过于重视经济工作，在战争年间轻视军事，不肯进攻大城市。

在具体经济政策上，上海那边的指示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在实践中发现这是行不通的，革命要尽可能多的团结各个阶级才能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所以他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把田地公平分配就好，让富农也为革命做建设，给地主也留以活路。结果是什么前文也说到，被批判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毛说，我这一切可都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啊！他曾经对警卫员说过“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战争稍有间隙毛就会亲自跑到各地调查。大家可以去看看《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里面收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等一系列当时的调查，其全面、细致、调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另外还有文章讲解调查方法、说明基于这些实际情况今后工作的方向及具体内容等等。



不仅自己调查，老毛还发布命令：

“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

但是，当他抬出来调查报告来反驳上海中央的时候，却又被扣了个帽子叫“狭隘的经验论”。

好吧，共产党不是军阀，个人有再大意见也要服从组织决策，党中央决定要打那就打吧。可是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一下都没休息，打了快一年了也没什么大成果。现在军队人困马乏减员迅速，军费军粮也没多少剩余，你们一不允许休整二又批评我们筹款浪费时间，这仗还怎么打？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迫“养病”

老毛终于忍无可忍，他和其余三人提议中央的人来前线看看情况，然后开个前线会议讨论。中央局刚开始都以“太忙”为由拒绝，并要求他们执行命令。

没想到四人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按原计划搞起了根据地建设，为第四次反“围剿”紧张地作起了准备。同时继续电告中央，来前线开会讨论，



因为此时第四次“围剿”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中央也忍不了了，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而后当时的常委会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内容有两个，一是批判毛的主张，二是讨论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该怎么搞掉毛的权力，得出的办法是会上不指名地狠狠批判，然后把他调到后方。

常委会议结束后，中央局立刻给前线回电，决定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这场会议很有意思，许多地摊文学做过各种版本的描述，说什么周毛争权，什么毛吐血三升之类的。我们不去理会这些说法，看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议主要有 8 个人参加，前委的朱毛周王，后方的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其中周恩来是开到一半时赶到的。会议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讨论红军将来的战略。

后方领导认为，应当继续对主要城市展开进攻，扩大苏区，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以进攻对抗国民党的“围剿”进攻，并且再次提到上海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方针与分析。

毛反对他们，认为红军现在没有实力主动发动大规模战役，应该以防御和建设为主，放弃大城市，向山区扩大根据地，准备应对马上到来的“围剿”。

后方领导继续强调了这代表上海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确实发过几封电报，指示中共尽快进攻大城市。

其他前委成员（朱王）认为，应当结合前方实际贯彻中央指示，也就是同意了中央的基本路线占领江西，但觉得应当在时间、具体行动上有一定调整。

毛一个人坚持原来意见，坚持不让红军离开苏区主动作战，反对其他所有人以及上海中央以及共产国际。



会议第二个部分是讨论进攻城市战略实施以来（也就是新中央上任以来）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评价。

除毛以外其他人认为，成绩是主流，那些失败只是技术上的原因。也就是同意继续实行进攻城市战略，只不过具体进攻战术上需要调整。

毛一个人反对所有人，他说“早就应该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了”。



中央继续反驳，认为攻击大城市在战略上绝对正确，几次失败的原因有大概如下：一个是轻敌，没想到敌军坚守的顽强，导致久攻不下，援军赶来，腹背受敌；第二是爆炸技术有缺陷，导致没能炸开城墙；第三是某些时候犯了分兵的错误。总之都是战术、技术上的失误所致，只需要吸取教训，以后的攻打总会成功。

毛再次反对所有人，他坚持认为攻打中心城市犯了盲动主义错误，这个战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完全错误**的，在此指导下不可能取得胜利。



但是此时他只有一个人了。

会议通过决议：

- ①一方面军在前一段时期（按照毛的建议）向赣东发展是错误的。
- ②所有红军马上做紧急战前动员，主动出击，在国民党形成合围之前，逐个击破其“围剿”的队伍。

会议继续批判毛，认为他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组织观念错误，并提出免去其政委一职，回到后方负责中央政府事务。

周提出异议，认为毛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军队，自己监督方针的执行，或是自己主持战争但是由毛做助理。

朱德、王稼祥附和。

中央局认为，毛坚持错误，没有悔改，不可能由他负责战争，那会使中央的政策得不到贯彻。但是考虑到前委诸人的要求，最终同意他留下做周的助理。

会议结束。

毛明白，即使自己留在前线也没什么用，中央战略已定，周朱王也都同意，自己提出的防御建设以求反击的思路不可能实行，留下来顶多是打几个无关大局的小胜仗。

于是他提出，自己身体不适，渴望回后方休养。

中央立即同意。毛就到了福建长汀县福音疗养院疗养——贺子珍在这里刚生了娃。

一段时间后，中央觉得毛不在许多事情有些不好开展，毕竟他在根据地威望很高，于是给毛写信试探询问，看他有无回来工作的意象。没想到毛回信又把中央批判了一番，说他们的决策全部都是错的，应该改变战略，以巩固、防御为主。



与会人员合影



没办法了，只能让他继续修养。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著名的批判“罗明路线”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毛再到疗养院后碰到了同在疗养的罗明，他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二人展开交流，罗明十分赞同毛的理念。出院以后，罗在福建推广了毛的理念，扩大巩固根据地，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展开游击战争。

本来这件事情没什么，福建不同于江西，革命力量较弱，中央并没有明确要求它们像红一方面军那样进攻大城市，福建的领导也十分同意罗的主张，而且福建的革命工作在这套理念的影响下开展得相当好，因此也没有遭受干预。

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件事情——博古来到福建了。

博古一直在上海指导全国的革命，此时上海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十分危险，上海中央就准备转移到江西去，先经过福建的根据地中转。博根本没想指导福建工作，就是路过而已，巧的是，他在上杭遇到了罗明。罗很高兴，难得碰到上海的首长，可是博古却有点生气，上杭县是边远地区，他不知道身为省委书记的罗明不好好搞全省的工作来这里做什么，以为罗是玩忽职守。

罗解释他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这下糟了。



博古这发型，果然上海滩

中午吃饭时，有人提议博古去看看在附近疗养的毛，博拒绝，而后很快便启程了。

到达瑞金后，博古立刻开会指责罗明反对中央路线，犯了大错，号召展开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

先是福建根据地的干部被大量免职。

而后江西的一批人成为了“罗明分子”。

开始仅仅是撤职，后来又判刑的，开除党籍的，甚至有被杀的。

就在这当口，凯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停顿一下，我们做个简短的总结。

前文提到过，反“围剿”失败乃至被迫长征的最深层原因要到三四次反“围剿”之间这一年里去找，现在想必大家都明白了。

第一，这一年红军不仅没能得到休整、发展，反而执行进攻大城市的路线，受到了消耗。

第二，对第四第五次“围剿”没有长远规划，快开始时才仓促准备。

第三，批判罗明路线导致军心不稳，大量干部流失。

第四，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没能趁机发展，反而遭到更大的破坏。为了应付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过度征兵，使得苏区几乎无壮丁可用，财政紧缺，强迫富农“捐款”，后来许多中农甚至“被富农”。

徐向前回忆说：“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很多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总之，内部出现了问题，对外的失败就是迟早的事。

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抗命而转败为胜

除了瑞金政府所在的赣南根据地外，当时还有两块比较大的根据地，湘鄂西和鄂豫皖，它们的“肃反”比瑞金更严重，军事干部损失更多。蒋介石也懂逐个击破，于是集结了 50 万大军对这两地率先开始进攻。

湘鄂西的主要指挥是贺龙、夏曦等，执行中央既定的军事方针，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主动出击，进攻敌军所在城市。

进攻全部失败。人员损失惨重，被迫转移至洪湖根据地。

“围剿”军队跟踪追击，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

鄂豫皖根据地指挥是张国焘、徐向前等，执行中央既定军事方针，在敌人形成合围之前主动进攻敌军所在城市，希望夺取武汉，完成湖北独立。

进攻全部失败。人员损失惨重，被迫沿平汉铁路转移，一直撤至四川北部。

蒋终于调集所有兵力对赣南根据地进行“围剿”，战术是“分进合击”，三路出击，围歼红军。

中央局要求红军执行既定战略，先发制人逐个击破，趁敌人形成合围以前进攻其中路军据点——南丰。国民党中路军的总指挥是陈诚。

一方面军执行命令，激战一夜，未能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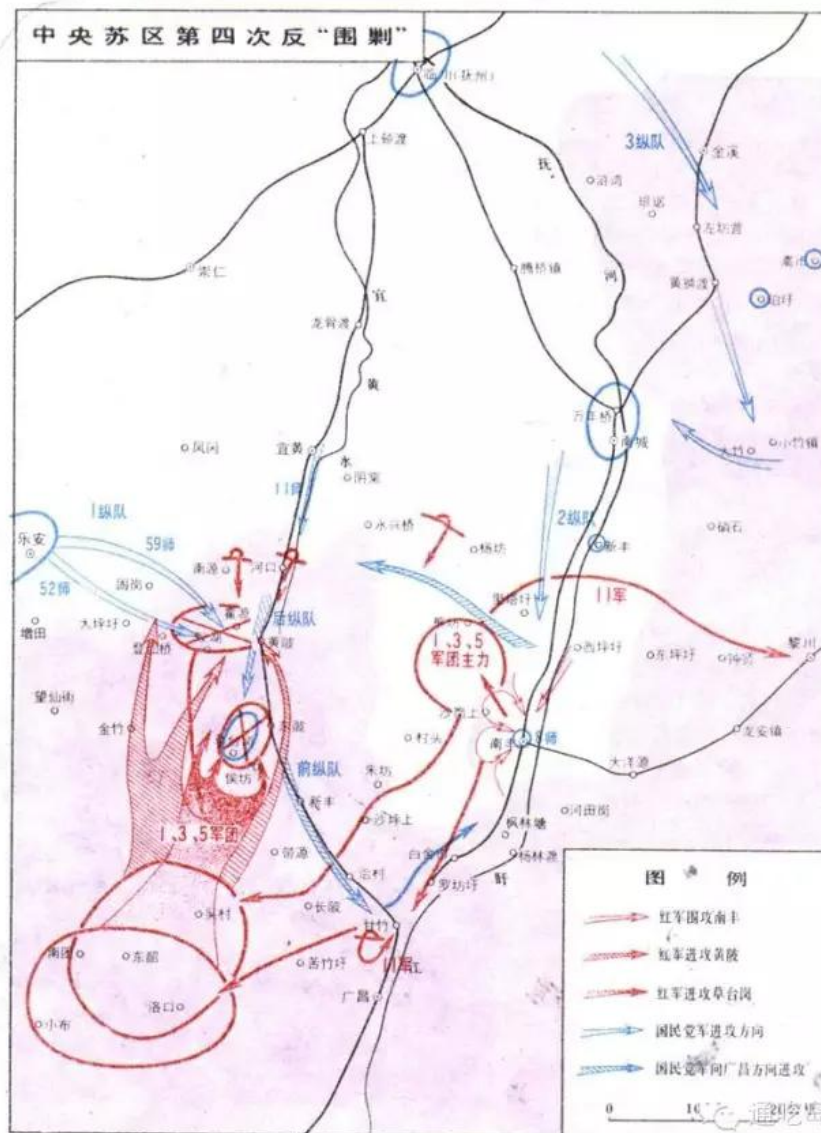
陈诚当即决定，由南丰城内军队拖延红军于城下，中路军其余部队绕至红军后方进行合围。（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朱、周发现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表示南丰易守难攻红军损失太大，此时敌军将要合围，我们应当佯攻南丰以迷惑对方，主力部队伏击其援军。

博古继续命令进攻南丰。

朱、周拒绝执行命令，秘密转移主力到敌援军必经之路上隐蔽，并命令红 11 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向黎川地区撤退。





敌军不知红军是否是真的撤退，最终还是选择追击。

朱、周探明敌军追击方向，冒雨转移红军隐蔽地点至黄陂附近。

一天之后，排小部队诱敌进入伏击圈，经过两日激战，歼灭两个师并活捉其师长。

国民党得知此消息后，改变原有战略，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轮番向前搜索，企图找到红军主力并与其决战。

朱、周继续命令 11 军为诱饵，引其前纵队向广昌移动并将其拖住，而红军主力则集中于后纵队必经之地，从其侧翼展开进攻。

经过两天两场主要战役，又歼灭大量敌军，国民党中路军后纵队遭到重创，前纵队只得退却至抚州。其余两路敌军也逐渐后撤。



这几日共歼敌、缴枪万余，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胜利，此时正是 1933 年 3 月末。

5 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更猛烈的第五次“围剿”要开始了。

朱德与李德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共双方的一些基本情况。

共产党这边，大的变化有两个：

1. 朱德被调离中央权力中心
2. 与此相对应，李德进入中央



朱总年轻时候，也很帅吧

首先说第一条，朱德常年担任军队最高领导人，在军中威望极高无人可比，这造成的问题是，博古发现，许多问题必须征求朱德的意见，他自己不能拍板，朱德前线抗命他也毫无办法，况且人家是军委主席，便宜行事也不算抗命。于是博古搞了个小花样。

原来红军的军委是设在前线的，由朱德担任主席，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朱德周恩来他们回到瑞金，博古组织开了个会，决定军委转移到后方瑞金，前线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看起来没问题吧？问题再后面：

1. 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
2. 当朱德到前线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

军委就是战争的时候权力最大，战争一开始朱德肯定要去前线指挥，他一走项英就成了军委主席，而项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博古在军事上又完全依仗李德，等于说战争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成了博古和李德，朱德仅仅变成前线的一名执行者。

现在说第二条。我们中学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博古李德”总是同时出现，大家只是记得他们决策总是错误，李德好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印象了。那李德是如何进入领导核心的呢？

其实严格来说，李德不能算作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真的有些莫名其妙。我们先理一下王明、博古、李德三个人的关系。



李德是德国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也算科班出身，毕业以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王明。

王明出身平民，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可以说极其聪明，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俄语，学习努力，再加上长得帅（不下于周总理啊！），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任教、翻译、组织工作样样精通，他甚至给斯大林担任过翻译。

博古则是王明的学弟，比他晚一年进入中山大学，二人私交很好，因此王明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一直让博古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好了，现在说李德的“传奇”经历。

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做针对日本的谍报工作，干了没几个月觉得实在太危险了，就离开东北去了上海，要求在中共中央工作。本来估计他也就是想在这里避一避，找个机会再回苏联，没想到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

当时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对军事并不了解，因此向苏联要求提供军事顾问，苏联答应派施特恩过去，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说中的军事顾问一直没来。



李德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摄于延安

博古着急啊，没有军事顾问我们怎么开展军事工作？难道任由江西那帮泥腿子们瞎搞？这时候，李德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身份出现了。

大鼻子外国人（虽然不是苏联人）、共产国际派来的（虽然是做谍报工作）、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虽然没打过仗），再怎么也比江西山沟里的那几个农民可靠啊。而且，还是我的好朋友王明的好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施特恩没来，那就他了！

于是乎，李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他一个在东北搞情报的，怎么就到了上海呢？不知当时的李德作了两句什么诗，他是德国人，或许就是

“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
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
——《浮士德》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赶到瑞金，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蒋介石并非浪得虚名，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将战略战术做了改进。首先是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联系当地地主富农，采取“保甲法”“连坐法”等等，并对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具体讲，就是进一步细化堡垒战术，每天只推进四五十里，下午三点前宿营（防止红军夜战），入夜前筑好工事，第二天继续行军，由后续部队接管这一套工事作为后方。

战略上讲，100万兵力分为四路，北路作为主攻方向向南压缩，南路主要负责占领据点、通道防止红军南撤，东西两路配合北路进行夹击，另外附有飞机200架随时准备机动。

红军怎么办？

中央局（博古项英实际领导，其他还有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不固定）认为应当采取“分离作战”方针，分为两路，北路抗敌，东路入闽作战。

周恩来、朱德反对。他们认为应当集中所有力量对抗北路之敌。

中央局拒绝接受，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后者由彭德怀任司令入闽作战。

此时国民党部队还在修筑碉堡封锁苏区，并未开始主动进攻，中央局命令两路红军尽力占领据点、打击筑碉敌人，破坏封锁线。

中央军取得零星胜利，但未能阻止“围剿”碉堡封锁线的最终完成。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北路军3个师进攻黎川。此时黎川的主力部队出去进攻城市打破封锁了，留在城中的只有70余名干部和300警卫……

黎川城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的闽赣军区司令部司令肖劲光，请求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没想到博古和李德（刚到不久）竟然命令肖死守，不得丢掉一寸土地！！300人死守3个师的进攻？！！



建国后的周恩来与肖劲光

刚开始我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印错了还是怎么着，后来证实无误后才



发现，肖劲光曾经也是“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支持毛的战略方针，属于“漏网之鱼”，博古可能是想借此机会把他搞掉。

肖劲光心想自己不是蝙蝠侠，手下这 300 人也不是复仇者联盟，怎么可能扛住几百倍的敌人，于是就撤了¹。

博古、李德随即命令已经入闽的东方军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保住根据地的“北国门”，具体战术是由红三、红五军团进攻硝石（敌军主要据点），逼退黎川军队。

战斗五天，未能攻克。

军委命令分兵第五军团进攻黎川县另一据点资溪桥。

连攻四日，未能胜利。

军委命令红三、红七军团离开革命根据地，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等据点，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敌人出动，并将其歼灭。

进攻三天，全部失败，既未能攻克据点，也没能调动出敌人。

在连吃一个月败仗后，终于 12 月 12 日，红三军团（一万余人）于黎城团村击败四倍于自己的敌人，但可惜的是仅仅是“击溃”，并没有多少缴获，这种战斗在老毛看来算是败仗。朱德、周恩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致电项英，分析这次没能大部歼灭敌人的主要问题在于分兵，并建议军委，应集中红三红五红九红七等军团主力，与敌人主力寻求决战。

军委复电，不同意建议，并命令再次分兵，红军主力西调进攻堡垒群，并且，更严重的是，24 小时之内 4 次变更作战命令。



当时修筑堡垒的战士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提到命令屡次变更严重影响了前线有序的军事行动，由于战场形式千变万化，希望中央能够给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力。

4 天后，中央回电，不仅“相机行事”的权力没批下来，前线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都由朱德担任司令）也被撤销，并入中革军委，前线一切师团由中

¹ 当时情况要复杂一些，具体守不守肖劲光和时任省委书记的顾作霖还有争论，我这里就简化描述了。再讲一下后续，3 个月以后肖劲光在瑞金被公审，周恩来被指定为公诉人。李德建议把他枪毙，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坚决反对，最终决定开除党籍军籍，5 年监禁。一个月后，在毛的反复努力斡旋下，肖被释放，安排至红军大学教书。后来周恩来曾因此多次找肖道歉，反复检讨



央统一指挥调动。

本来 11 月末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深蒋光鼐等领导 19 路军（就是打淞沪会战的那个）起义反对蒋介石，另立新的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合作。此时按照毛的想法应该集中兵力并联合 19 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取得反“围剿”胜利，可是当时中央（包括周恩来）却认为应当假意与其联合，实际让 19 路军与国民党斗个两败俱伤。

于是在国民党忙于消灭 19 路军，对瑞金政府采取守势时，中央认为此时距福建较远的西部敌方应当是空虚的，就将主力西调，对国民党防御的堡垒地区进攻。

全部失败且伤亡十分严重。此时根据地兵力极端紧缺，竟然到了发动少先队员参战的地步。

“图上作业的指挥家”

1934 年 1 月，由于蒋介石全力镇压“福建事变”，苏区稍微缓过一口气，集中开会（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种附属会议）商讨应对办法。但是这些会让毛周等人很憋屈。

首先，六届五中全会没让周总理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这是非常罕见的。而后在会上博古发言道目前中央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反右倾，不仅如此还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也就是说只要发现右倾就坚决干掉（应该是针对肖劲光这一类事件提的）。博古还认为，革命就快要胜利了，只要第五次反“围剿”成功，全国革命就会胜利……



结果最后，没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又被指定作闭幕词。你们这些玩意儿都没和我商量就通过，结果最后又让我闭幕总结，啥意思啊？！

然后再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给大家（几个核心人物）的消息是，要把毛踢开，让张闻天代替他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觉得不妥，就去找博古，博古却仅仅说毛不用管这些日常事务，而后就不多解释了。

果然，大会先选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天后召开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张闻天接替。这两个主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别急，没过多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颁布，明确地告诉了



大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毛保留的这个主席是虚职，张闻天接任的那个是掌实权的。

这帮人政治手腕高啊。他们来之前，毛是红军政委、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当时名称有所不同）、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他们来了以后，先免了军权，再免行政权力，给你挂个空职晾在那，发表发表声明，念一念文件。

这次大会的军事讨论部分李德提出了他的新战术——“短促突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堡垒对堡垒”，你国军不是修碉堡吗？我们也修！你们不是缩在碉堡里不出来吗？我们也缩，一直等敌人出击了，红军再从工事中出现，搞个小范围突击。

嗯，一些前线指挥员称这种战术为“肉包子打狗”战术。每次英勇的“短促突击”出去的红军战士都在国民党那边强烈的炮火下全军覆没，再也未能回来，仅仅两个多月，红军的伤亡就以万计。



朱、周其实并不赞同这种打法，他们在这期间反复强调要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在堡垒战的同时不能忽视运动战游击战。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堡垒战要求在所有重要地点设置防御阵地，兵力极其分散，而运动战要求集中兵力，以红军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同时兼顾的。

4月10日，国民党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另有一个炮兵旅、200架飞机配合作战。

博古大惊，集中九个师进行广昌保卫战，“守住根据地北国门”。

博古李德亲上前线指挥。

4月21日下达死守广昌命令，“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飞机轰炸之下坚守到底”。

4月27日，国民党总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先受不了，我军堡垒在一瞬间被飞机大炮摧毁，提议撤离广昌。

4月28日，广昌失守。

广昌保卫战共歼敌2500余人，红军伤亡5500余人。彭德怀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对此十分不满，在这种战术下，每次出击的红军战士都是全军覆没，他大骂李德



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其他指挥官也不满，比如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找李德提建议，希望改变打法。

几天后，刘伯承就降成了 5 军团参谋长，离开中央。

张闻天原来算是博古的支持者，此时也因为广昌失守强烈批评博古，二人关系恶化，这对后来的遵义会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我们后面会说到。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北部已无险可守，转移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中央于是开始筹备相关的各项事务。

那么老毛这段时期都干了些什么呢？

前面已经讲过，蒋介石这次“围剿”的策略是四面包围但以北路为主攻方向，所以整个中央的注意力都在北面战场，根据地南边的自主性更强一些，于是毛就到南线搞调查去了。

调查过后，他和粤赣军区领导们（何长工等人）交流，主要给出了两条指导性意见，这意见狠狠地黑了博古等人。为啥这么说呢？

第一条，吸取“福建事变”教训，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第二条，“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这就和他原来在会议上的发言、给中央写的信一个意思：中央过去错了、现在也错了，从接手的一开始就一直都是错的。



而后毛又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大概思路是撤掉大部分守的据点，把主力集中起来整训，然后再分散出去打游击战，争取把敌人“肥的脱瘦，瘦的拖垮”，找到好打之敌之后迅速将其歼灭。

不久后，南线的二十二师开会总结之前一次失利的教训，毛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到电话打过去，详细了解情况，而后再次强调了之前的思路并予以具体建议，从军事到政治到情报到群众工作等等（他一向认为这是个整体）。

政委方强等人很同意毛的看法，于是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布置了作战方案。

这之后，南线情况逐渐转好，二十二师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缴获颇丰。

然后方强就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理由是没贯彻中央指示，走罗明路线。

二十二师的战士们不服啊，凭啥打了胜仗被调走（当时没说进保卫局），打了败仗的却可以继续干？

一段时间后，毛重新回去考察，开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这个问题，表达了不满。毛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四个字，却真的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让人付出巨大代价。就是这位被关进保卫局的方强，因为坚持真理长征时被张国焘再次关进保卫局，1982年又因为坚持真理而从海军司令员任上退休。老爷子身体非常硬朗，2012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祝坚持真理的人都能长命百岁。

我们回到主战场。之后的这近两个月里，双方互相试探，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共产党这边谋划着转移，国民党那边谋划着总攻。

七月上旬，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发动总攻，近100万人从六个方向进攻苏区。

博古等命令针对敌军进攻，分兵六路抵御，严守各路口要塞。

一路也没抵住，根据地范围进一步被挤压。

派红七军团突围，企图打到敌占区，以此调动敌军。思路不错，而且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说国民党用“围剿”封锁着红军致使其无法抗日，这支队伍要突破困难坚持抗日，名正言顺，反正战争年间大家都在为政治宣传吹牛，强调自己的正义性，也无可厚非。可是……一共就派了不到7000人，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咋调动啊……

转移的决定在几个月前就做出了，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路线，红七军团失败了，中央决定让红六军团再去前面探(song)探(song)路(ming)（这是由被打散的师、团等新组建不久的一只队伍，由萧克、任弼时等人领导）。为了讨论具体往什么方向探、怎么探，开了个会，老毛参与了。



会上，李德等人认为应当派红六军团向贵州方向突围最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向那里转移打前站。

毛不同意，他认为不应寻找红二军团，整个中央红军应当集中兵力，直接挺进敌人力量弱的湖南中部。因为红二军团与中央之间是敌人布防的重点，突围压力大，且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群众基础，政治经济等工作难以开展。

李德等不同意毛的看法。最终大会的结论是，先让红六军团向湖南方向突围，待机与贺龙部会合（真正原因是，中央并不知道贺龙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在贵州，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1934年7月，红六军团就这么着成了最早开始长征的队伍。

果然不出老毛所料，红六军团从强渡湘江开始（对，他们就已经渡过一次了）一路经历无数场恶战。更要命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中央在完全不了解前线战况的情况下一直对他们进行远程指挥，很多次好不容易突围出去，中央一纸莫名其妙的命令又令红六军团再次陷入重围，如果不是萧克王震等军事领导的卓越指挥与一定运气成分，这支部队早就不知道覆灭多少回了。

咱们继续讲江西根据地的情况。

西征的军队派出去不久，国民党就集中9个师由北向南开始向瑞金方向进攻。红军以3、5军团为主进行守御，主要是依靠据点打阵地防御，经过20余天的数场战斗，虽使敌人死伤4000余人，自己也伤亡近2500人。貌似是占到便宜，可红军无论战士还是物资都是打一点少一点，国民党那边却是源源不断，这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月31日，广昌驿前镇被攻破。至此，根据地北路、东路（福建）皆崩，再也不可能待下去，必须尽快开始转移。

整个九月，中央都在加紧部署转移的相关事宜，动员、征兵、整编、物资整理、情报搜集等等等等吧。战斗方面互有胜负，无关大局，不多提了。

老毛呢？他十分担心目前红军的状况，又深知自己在中央说不上话，于是请命到于都地区视察，并在那里做了半个多月的细致调查，以军事、政治情况为主。

九月底，突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派医生过去这才渐渐控制住病情，后来博古差点以此为由将毛留下不随军长征¹。

九月末十月初，红军将各地守备交接给地方部队，国民党部队也基本集结完成准备发动最后一攻。

中共中央决定，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指挥二十四师与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留守根据地，其余人准备参加战略大转移。整个转移的最高决策机关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

10月10日，瑞金，八万六千人，当时尚不知究竟多远多久的长征开始了。

¹ 另一边的陈毅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前不久被弹片击中胯骨，伤势很重，无法随军行动，后来没能参加长征，留在根据地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历经无数磨难，那才叫九死一生。

遵义会议



历史课本上面对于长征的叙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博古李德是书呆子，生搬苏联那一套指挥红军屡战屡败，然后开了个遵义会议惊天大转折，毛主席从此成为领导人，屡出奇招带领红军大翻盘实现逆转。

这不能说错，但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长征中党的高层分歧一直很大，斗争非常激烈，遵义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会议，而是长征前中期一系列会议的代表。同时，毛泽东并没有通过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相反仅仅两个月后的四渡赤水期间就再次被集体投票免职，刚渡过金沙江又被一线、中央的几名领导人集体弹劾。

这一章主要讲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结束这3个月左右的事情，会议是如何酝酿的，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山沟里的农民是如何逐渐赢得大家信任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湘南争论——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长征究竟要往哪里去？这是关系红军命运的问题。博古、李德决定，第一步是去湘西、贵州与贺龙他们汇合（此时先头部队红六军团尚未到达，但是已经与贺龙他们取得联系，得知红二军团的确切位置）。但是这个计划只有三人团和朱德知道，连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这一级别的都不清楚，他们得知的信息是从西南方向突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迷迷糊糊地走着，方向、目的全部不了解。

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的消息，立即下令白崇禧、陈济棠等人在湖南、广西方向阻截，自己的嫡系六路军追击。

这时候的红军十分危险，一字长蛇阵行军、大量笨重物资携带，很容易就会被分割包围分别歼灭。幸运的事情在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

陈济棠早在一个月前就和共产党秘密签了停战协定，白崇禧等桂系怕蒋介石借此机会抢占他们的领地，因此派驻兵严密防守，倒是防蒋介石部队多一些，防共产党少一些。其他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有原本就靠近红军的，此时为了保存实力都避免率先和红军主力开战，磨磨蹭蹭装模作样地行军。

此时老毛的想法是，应当利用这种局面，趁敌军各怀鬼胎尚未靠拢，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或能打开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对，上篇答案提到毛的军事思想中，掌握主动权是他非常看重的一条）。

中央并不赞同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多跑一点算一点。

这种观点也不算错，仅仅用了一个月，到 11 月中旬，红军就“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附近。而此时，国民党的部队也已集结完毕，四十万大军集结在湘江、潇水一带布成一个口袋阵候着红军。

共产党内部，一场后来被陈云称为“湘南争论”的事件正在酝酿、发生。这个事件如今鲜有人知，但却极为重要，可以看做是不久之后遵义会议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它标志着老毛性格的转变。

大家看我之前的文章就会有感受，毛总是喜欢“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虽然最终事实都证明了他的正确，但许多人不喜欢他。其实“反对”还不是关键，毛不受欢迎的更大原因在于他说话不留情面，有什么说什么。



前面讲过的什么“中央过去七个月全部都错了”之类的事情也就不多提了，更早一些的时候，毛甚至和朱德等人激烈争论，后来为此召开古田会议，讨论“党指挥枪”等问题。毛与其他人针锋相对，认为党应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重中之重，战争中前委应该有绝对的指挥权等等；而朱德虽然同意党对军队的领导，却认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大于政治工作，不赞同把大量精力放在根据地开辟建设上，同时认为应当削弱以毛为书记的前委权力，等等；更有许多人根本不同意“党指挥枪”。主持会议的陈毅就和稀泥，大概就是说，大家都有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问题，分别是如何如何，我们要从长计议诸如此类。

而后毛就批判他是“陈毅主义”，这下把党内的中间派也都得罪了，他也就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好在朱毛陈三人都非常大度，从不记私仇，其争论都是为红军着想，后来陈、朱二人想通之后又请毛回来官复原职，并未影响以后的关系。

可大度的人毕竟是少数，毛由于正确的领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前线战士和根据地群众之间威望极高，但在中央却比较孤立（哎，建国后好像又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明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却总是无法通过，有啥用？

所以毛开始了改变，决定努力团结大多数。

与此同时，博古也逐渐感到自己的帅位不稳。自他上任以来红军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大的胜利，连续的失败让其他领导对他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并且许多人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到如今，竟然连根据地都丢了，红军不得不进行所谓“战略转移”。

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博古首先将一些朱毛时代建立的队伍解散，打散分配到各个新组建的队伍中；长征出发前，又将除三人团和朱德外其他中央局成员分散到各个新队伍中，等于是将其他人彻底隔离在中央决策核心之外。

毛对此当然不爽了，郁闷之中却得到一个消息——张闻天对此也非常不满，于是他主动联系张，并向中央提出，希望在长征时把他们这些政治委员分到同一队伍，留在中央。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才得以同主力红军一起行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毛、张二人才逐渐来往密切了起来。

而后的长征路上，毛与张王二人持续交流，三人逐步达成了一个共识——博古没有能力领导红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尚未完全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张闻天先得到一个消息——中央决定强渡湘江。他对此十分反对，于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二人。老毛和王稼祥曾长期直接指挥军队，当然是更加反对。三人商讨之后，决定让毛作为代表立刻去找三人团反映，



张闻天



提出他们的意见——这毕竟关系到红军的生死。

其实强渡湘江的决议许多前线指挥官都不同意，彭德怀已经和中央表示了反对意见，没用。而博古和李德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他们认为，既然是转移，就一定要快，在敌人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迅速向目的地湘赣边界移动。而且，自长征以来红军胜多败少，行动迅速，所以他们由此认为自己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毛去找三人团的时候正是深更半夜，当时有五个人，毛、周、博、李以及一名德语翻译，毛主要是和李德交流，周、博在一旁听着。这次他也不像从前了，虽然完全不同意渡江，但是毛并没有对李德进行批判和反对，而是提议能不能先集中兵力打湘南的敌军，如此这般将敌军阵脚打乱，之后再视情况考虑渡过湘江。

李德果断反对，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耽误时间，他认为转移需要迅速。

最终博古说话，大意是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我们会考虑的。

毛无奈离开。

那三人团中的另一位——周恩来呢？三人团有明确分工，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的任务是“督促军事决策的执行”，其实就是和稀泥，联系中央与前线，调和双方分歧，没什么决策权。于是毛走后，他向博古建议，做两手准备，对在湘南建设根据地（他懂毛的意思）也进行一些布置。

所以后来成立了一个……湘南营，一共 200 来人……哎……

血染湘江

强渡湘江计划照常进行。

国民党那边的情况，我们已经提到，第四道防线共四十万人布置成口袋阵集结于湘江潇水一带，而蒋介石自比姜子牙，说自己在湘江边垂钓，愿者上钩。

11月25日，博古下达渡江命令。红军的计划是这样，红1、3两个军团为前锋，在两翼开路率先强攻，8、9两个军团掩护中央，紧随其后渡江，红5军团在湘江东岸掩护，阻截追兵等，待中央安全度过最后渡江。



来，凯申，吃鱼！

27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其过程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就是强攻、血战，非要形容的话就是惨烈。由于中央携带了大量辎重，又采取一字长蛇阵形，整个渡江过程非常缓慢，掩护部队必须承受敌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导致伤亡巨大。



12月1日，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江。但是一部分掩护部队却被切断，永远无法归队了。



湘江一战，从27日晚到1日中午，红军队伍由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平均每天减员近1万人。52天前，8万6千人的队伍开始长征，如今损失超过60%，尤其是干部损失更加严重，整个红军处在一片消沉情绪之中。

国民党那边。由于红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意图非常之明显，因此即使湘江防线被突破了也并不是什么大事，只需要继续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布置军队即可。于是，蒋介石命令何健在湘黔一带集结二十万部队，设置四道防线；以白崇禧等为首的桂系军继续追击。

危机中，红军内部终于爆发了公开的争论。

遵义序曲：通道、黎平、猴场与乌江

事情是这样，渡过湘江后，李德把军事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负责掩护中央纵队的红9军团22师师长周子昆身上，要将其送上军事法庭。毛认为不妥，出面保护了周，李德结合他前段时间保护萧克的做法，斥责为“收买残兵败将笼络人心”，毛反过来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指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指挥的失策。

随后，毛又提出，鉴于敌军最近的军事布置，红军若仍然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无异于自寻死路，他认为，应当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那里开辟新



的根据地。

李德否决。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西南部的通道县，次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与会人员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



会上，毛（同张、王）继续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应当西进贵州而不是北上湘西。

朱德、周恩来表示赞同。

李德怒而离会。

博古只好同意暂时改道向西面黎平方向前进。

12日当晚，中央发出紧急电令，红军改变方向，向西前进，但目的仍然是寻机北上至湘西，并电报贺龙任弼时，中央已进入贵州，马上可以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让其做好接应准备。

蒋介石完全没想到红军的战略改变，湖南至贵州方向并无准备。于是，红军一路进展顺利，连破黔军部队，15日占领黎平县城，16、17日中央机关陆续进入抵达。

周恩来与朱德二位商议后认为应当继续西进，向贵州前进，并向李德提出此建议。

李德拒绝采纳。

老毛在此期间反复建议中央，开一次会彻底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此时终于被接受，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更加精彩的斗争终于来临了。

目前关于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并不多，甚至连会议主持者、与会具体人员名单等基本信息都有较大争议，我暂且按自己赞同的考证结果给大家说说，好在这些争议对会议核心内容影响不大。

朱德、周恩来、博古、李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凯丰、邓发参加了会议，最直接的议题就是红军下一步是否要与二、六军团汇合。其中凯丰和邓发二人支持一直以来李德的决议，不过他们和王稼祥三人是候补委员，只参与讨论。

整个会议过程极其激烈，甚于通道会议。毛提出继续向西北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反对，坚持与贺龙任弼时汇合。火药味越来越浓，周总理竟然都拍案而起，怒斥李德。当时的李德身患疾，发着烧，这一急更加难受，中途就退出了



会场。

博古看中央委员中除自己外全部支持毛泽东，只好默不作声。之后，又陆续讨论了一些问题，形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定，捡重要的说一下：

- 1.取消与二、六军团汇合的任务，红军继续向贵州方向前进，初步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向西北延伸的根据地。
- 2.重点对付黔军，对于蒋的嫡系以及桂系湘系部队能避则避。
- 3.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另外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民族政策。
- 4.确定，近期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彻底讨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目前党内领导意见分化问题。（也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以上内容里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第三点，这是毛的独家内容，也是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他、与他意见相左的最关键所在。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战争年间应当以军事工作为中心，和平年间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很好理解。但是毛却始终坚定地认为，任何时候，不管搞什么工作，政治工作都是第一位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终的战略上的胜利，而其他做法最多只能获得局部的、眼前的利益。

这一点从始至终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理解、赞同，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毛在党内一直就是少数派，而且这一派只有他一个人。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在 30 年代使他被排挤出权力中心，50 年代以后再次使他陷入孤立，一直到今天“政治挂帅”都在被从上到下彻底批判。

究竟孰对孰错，我不多说，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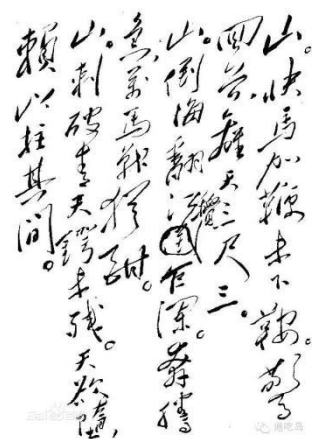


记住上面的话，咱们接着往下讲。



这一天其实还发生了许多事，比如各部队重新整编，刘伯承重新被提拔，成为军委纵队总司令等等，总之，形势对博古、李德愈发不利。

由于黔军战斗力是在差劲，12月下旬，红军连克七座县城，极大地补充了物资，并且逐步开始获得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红军向猴场方向集结，为渡过乌江做准备。



插句闲话，老毛在12月的战斗行军期间陆续写下《十六字令三首》，想必大家在学生时代都背过：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历来写山之高险的诗有很多，与天作比较的也不少（昆仑即被称为“天柱”）。但浪漫如李白也只是讲“连峰去天不盈尺”，豪迈如耶律楚材也只写出“山角攀天不盈尺”，大家从心里就默认“天”是高的，山再厉害也只能“连天”“攀天”，始终差着几尺——老天最大嘛。敢于让山“刺破青天”，还令天摇摇欲坠的，恐怕也只有老毛了。多年以后，马里共和国的总统特拉奥雷与毛主席见面，称赞他为“历史上唯一的天才”，老毛却说自己顶多算个“地才”，地就是土地和人民，自己只不过将人民群众的经验进行了一些总结，没有人民，啥都干不成。

老毛相信“地”的力量，他穷其一生付出无数代价，就是要带领地一起，刺破青天。

我们回到正文，1935年1月1日，又一个长征途中重要会议——猴场会议召开。

会上，博古、李德再次提出不应当渡过乌江，而应该与二、六军团会合。毛再次反对，重申之前的意见，另外，继续提议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团结群众。

激烈争辩后，毛的观点再次获得多数主要领导赞同。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更重要的决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在一年多以前取消的军委集体领导，如今又重新得以确立。

1月2日-6日，红军强渡乌江。

1月7日，先头部队占领遵义，9日，中央机关入驻遵义。

由于这一段时期的连续胜利，红军终于在遵义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部队休整、补充兵员、补充物资。中央决定落实黎平会议决议，召开一次大会，提纲如下：



- 1.环境发生变化，是否继续黎平会议决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 2.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1月15日，千呼万唤，遵义会议召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开始了。

遵义会议——毛泽东真的确立领导地位了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与会人员：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

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总部和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另有李德列席。

那会议前他们的立场分别如何呢？

首先说王稼祥和张闻天。他们在最初都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博古的支持者。后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中一系列军事失败，慢慢地走到对立面，长征途中毛长时间找他二人尤其是王稼祥聊天，使得他们成为毛的支持者，尤其是王稼祥，不久前就已经和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刘伯承等等）传递，希望让毛代替博古。

于是，到达遵义后，王稼祥立刻提出召开一次大会，彻底反思近来的各种问题，矛头直指博古。

博古自然不能同意，他推说，黎平、通道、猴场会议早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没必要继续讨论。

而后，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三人去联系其他领导人，大多数人立刻同意召开，并且联名要求，包括朱德、周恩来。

其实，前线的军事领导（参见刚才提到的名单）不管是否支持毛，对博古李德都是非常反感的，因此非常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希望撤换领导。这其中，大家不太熟悉的李卓然，长征中主要负责殿后，井冈山时期曾担任过毛的办公室主任，更是绝对支持毛。

当时，站在博古李德这一边的，其实只有邓发和凯丰。



1月15日，晚饭过后，贵州冬天的寒夜，众人聚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围着煤油灯和炭火盆，开始了这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会议。

博古作为主持者，同时也是被检查者，进行第一个发言。他简单地回顾了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也说明了一些自己的错误（毕竟那么多败仗），但是却把军事失败的重点归结到客观环境，比如对手太强，100万部队，十分狡猾，政治环境不利等等，并得出结论，红军没有能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换谁都不行。

第二个，周恩来发言，作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而并非敌人实力太强，三人团应当负主要责任，自己作为军事负责人之一，也应承担责任。



第三个，张闻天发言。到现在都属于会议流程的正式发言，因此张闻天也是做了一个报告，叫作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直接从政治上否定了博古，认为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后来复原图，其实当时环境远没有这么好。一张长桌，几只破凳，十几个人挤在这里，激烈却又有序地

好了，正式的报告环节结束，与会人员开始发言。

老毛先开口了。这次他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他开会从不准备讲稿、提纲什么的，纯粹即兴（多说一句闲话，庐山会议本来准备了稿子，纠左，跟主要领导都通过气，结果一开场彭德怀画风突变，毛立刻把稿子放到一边，开了一场反右会议。这理论水平，比某些领导人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是这次不同，厚厚一叠讲稿。而后，连念稿带发挥，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十分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失利。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具体事例，一点一点地分析，紧紧指向一个核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但是，大家请注意，请注意，老毛这次没有说在座诸位都是垃圾，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会议应当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后又反复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是由于军事上的左倾，战略战术的制定不当而导致的失败，之后有人提出要批判“王明路线”，毛也加以制止，始终讲，先解决军事问题，核心是军事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老毛把他“政治挂帅”的独特思想先放到了一边，矛头直指军事错误，并提出这是最紧迫的任务，其他问题可以暂不作争论。这样一来，其他领导人身上责任就轻了一大半，更夸张的是，其实他连博古都没有做过多的批评，最主要就在批李德的军事指挥。

成熟了！

终于成熟了！

老毛在政治上终于 TM 成熟了!!!



从此再无敌手



所以，虽然老毛的发言超过一个小时，但大部分人都非常认真地听完，频频点头，前线指挥们更是赞同，那些问题分析的，都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批判博古李德，并提出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然后是朱总司令，首先支持毛的分析，而后怒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说他们崇洋媚外，听不懂行的外国人瞎搞，并且大声讲道：“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让寡言的朱老总说出这种话，那他得憋了多大的火。



想不到你们竟然为了一个山沟里的农民背叛
博古李德从苏联原装进口的马克思主义！

主要人物都说完了，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言。（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每天晚上，所以后面的这些发言是陆陆续续说的，具体谁先谁后我也无从考证，好在不影响大家理解）

这些人里面，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是十分激愤的，痛斥错误军事领导，举出了一个前线的例子。

还有一个很激愤的人，就是凯丰（何克全），不过他始终站在博古这边。就是他在这里对老毛说出了著名的那一句：“你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

其实老毛被冤枉了，他当时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

最重要的还是周恩来，他明确表态，首先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决策，而后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至此，会议主要决定出炉：

- 1.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 2.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 3.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 最后委托张闻天依照毛的讲稿和会议记录来起草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书面决议。

会议并没有完全开完，最后一天（17日）晚，蒋介石重新派出的黔军部队已经



逼近遵义城，因此会议遗留了两个重要问题：

- 1.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
- 2.常委出现变动后，如何分工

在会上王稼祥最先提出了让毛来接替博古，不过那是会议初期，这个问题还没进入讨论范围。后来确认博古下台之后，一些同志提出，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但是张不同意，他提议让毛来当，毛又推脱自己身体不好，只是可以指挥军队，当不了总书记。这个问题就搁置下了。

会后不久，首先确立了常委分工，毛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再不久后，在毛的一再坚持下，选定张闻天为总书记（一说没有这一称号，仅仅是“负总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不必深究）。

遵义会议至此告一段落。

下面我想重点说两个问题。

- 1.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遵义会议证明了党已经可以自行改正错误解决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实如此吗？
- 2.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后长征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这有道理吗？敢情别人指挥无论进攻防御撤退都是错误，就他正确吗？



遵义会议会址

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中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后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冰封雪盖的夹金山，穿过杳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在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第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军翻越雪山



股票大作手毛泽东——遵义会议问题总评

历史课本上面对于长征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博古李德是书呆子，生搬苏联那一套指挥红军屡战屡败，然后开了个遵义会议惊天大转折，毛主席从此成为领导人，屡出奇招带领红军大翻盘实现逆转。

这不能说错，但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在本书开头我说过类似的话）。通过前面的文章大家应该也已经发现，遵义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会议，长征中党的高层分歧一直很大，斗争非常激烈。

先是强渡湘江之前的湘南争论，这是一次非公开的讨论，仅限于高层的毛张王和博李周双方，争论的主题是究竟要不要渡过湘江，结果是博古方稍作妥协，组建了一个湘南营（和没有也差不多）。

而后是通道会议，争论主题是下一步方向——继续与贺龙部汇合还是西进贵州建立根据地。这次争论虽然仍然仅限于最高层（只比上次多了朱德），但重要进步在于，属于正式会议，更重要的是，毛这一派已经略占上风，博古最终同意“暂时西进”。

这之后是黎平会议，不仅参与人数众多（几乎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且最终结果完全倒向毛这一方，他的提议几乎全部通过，而博古李德的支持者只有凯丰邓发两人了。

以上两次的重大军事决议，全部都是开会解决的，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博古李德就失去了和从前一样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了。不久后的猴场会议，更是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恢复了军委集体领导制，而李德在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建议全部被否决，博古这一派告别权力中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遵义会议正是在此基础上召开，虽然召开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大势已定，也就是个时间早晚问题。它重要的地方在于更加全面、细致、系统地争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是对前一年多里各种大小明暗争论的一个大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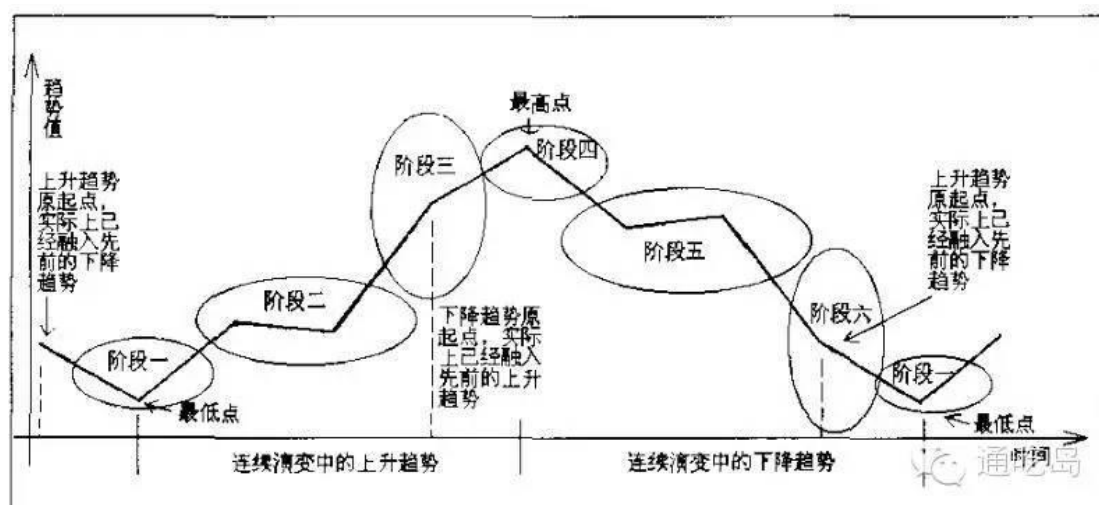
所以我觉得，课本上的那个总结有一定道理，但不大准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有些过分夸大它的作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也都否决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使红军得以生存。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些夸张，遵义会议后的红军更像是从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成长为有点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人，党的真正成熟应当是以45年延安整风完成为标志的，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个有着稳定价值观的成年的党才真正诞生。



另外，这一系列会议同时也记录着党主要领导人的变化。毛主席我们已经说过，一步一步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越来越懂得团结大多数的技巧。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周总理，这几次会议他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湘南争论是以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委婉地劝说博古考虑毛的意见，两边都不得罪；通道、黎平等会议是与朱德等人支持毛提出的战略方针；最后遵义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毛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党本身的转折。

下面谈谈第二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股票，即使没有亲自操作过也一定在各类媒体上常常听到相关报道。一般来说，股市演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如下图，不断循环。



（以下有关股票市场的内容并不严格，只为分析本文问题，不必深究）

从图上看，若想获得最大的收益，应当在一、二阶段买入，三、四阶段卖出，五六阶段不进行大规模操作继续等待时机。

然而，广大股民的表现可并非如此。我们听过无数例什么准新郎拿结婚钱入市赔光跳楼，退休职工拿一辈子积蓄入市赔光自跳楼，借亲戚朋友钱入市赔光跳楼等等的例子。



大多数人一二阶段都在观望、犹豫、患得患失。

第三阶段，本来是应当提高警惕的时候，大多数人却红了眼，盲目乐观疯狂入市。

四、五阶段，下跌没什么，赔了钱也没什么，这时候坚决平仓止损也就好了，可是大多数人却狠不下这个心，始终幻想股市能再涨起来，“再涨一点我就撤”，于是终于被套牢。



到了第六阶段，也不是没得救，应该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择机卖出，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可惜大多数人不是悲痛欲绝就是心灰意冷，胡乱地仓促卖出。刚卖出没多久， \uparrow ，怎么又涨了！

战争也是类似。

博古接手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红军连连取胜发展迅速，就像股票市场的第三阶段。身为投资高手毛泽东，深信“众人贪婪我恐惧，众人恐惧我贪婪”，已经看出了长时间战争造成的红军以及根据地内部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借此喘息机会赶紧解决（具体见第一章）。然而博古李德二人却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此阶段盲目乐观，也不掂量自己斤两就主动进攻白区，认为很快就能攻打南昌、占领江西、解放全中国。

第四次反“围剿”大概就相当于第四阶段，貌似胜利，其实双方在根据地的局势已经开始逆转。

第五次反“围剿”类似于阶段五，屡战屡败，本应及时止损，适当放弃，改变战略，当时由操盘手被贬为小分析员的毛泽东提出了几个思路，全被否决了——他们已经红了眼，说老毛逃跑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末期一直到遵义会议，阶段六，大盘持续下跌，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时投资高手毛泽东依然冷静分析，一路上找到各种比较好的时机，希望帮助红军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逆转局面。可是此时的操盘手博古和执行操盘手李德在狂跌的大势面前已经心慌意乱，只想赶紧退市，一心就是和红二六军团汇合，丝毫不考虑撤退的时机。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时常有读者给我评论，怒斥博古李德。我最初读历史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觉——“他们是白痴吗，怎么每次都能准确地做出最错误的决策”，但是之后明白了，他们不是白痴，只是普通人，如果让我们去指挥，只会更差劲。华尔街的天才利弗莫尔（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操盘术）曾经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共同的人性弱点的诱惑，每一次轮流下注时，都想参与一份，每一手牌都想赢。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个共同的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成为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头号敌人，如果不对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它最终将导致他们的溃败。满怀希望是人类显著特点之一，担惊受怕同样是另一个显著特点，然而，一旦你将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搅进投机事业，就会面临一个极可怕的危险，因为你往往会被两种情绪搅糊涂了，从而颠倒了它们的位置——本该害怕的时候却满怀希望，本有希望的时候却惊恐不宁。

已经进去的私募一哥徐翔，大家都熟悉，他的私募叫做“泽熙”，取自他最崇拜的两个人——毛泽东、康熙。



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而弱点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事情来临时却永远无法克服。

就是这么个道理。

四渡赤水



1960年，蒙哥马利来访中国，称赞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伟大，毛却回复他自己真正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自八十年代以来，对四渡赤水的叙述差异很大，捧的人把毛描述得“多智而近妖”，谈笑风生间随意调动敌人；黑的人又说这纯粹是造神运动的结果，四渡其实只是依靠破译情报和极好的运气来四处逃窜。

事实上，四渡赤水确实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第三渡还真的就是败仗之后的无奈之举，在这期间老毛还被集体投票再次赶出领导层。然而老毛所说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指的并非“四次”而是“第四次”，这第四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用兵之妙演技之高真叫人看得拍案叫绝。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忆秦娥 娄山关

上一章说到，遵义会议过程中，国民党军队集结、逼近，于是会议匆匆结束，红军继续开始行军。起初中央的打算是这样的，由黔北（也就是目前驻地）到川南，再北渡长江，和当时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配合，粉碎敌人追剿，在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

同时，博古李德下台后，红军开始确立新的军事指导方针，简单来说是这样，派小部队殿后，用游击的方式延阻追击的敌军，主力避免战斗，全力行军以迅速挣脱包围圈；一旦被敌军某部追上或从侧翼包夹时，则集中主力主动出击，迅速歼灭。

这个作战方针本身没有问题，能够发挥红军最大的优势，然而红军却继续遭遇了失败。

是这样，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可能会北渡长江，于是命令川军集结于长江以南红军的必经之地，同时不放松追击，企图来个前后夹击。

周、毛、朱、刘（伯承）商议后认为，追击之敌并不集中，是一波一波分别赶来，最前面的郭勋祺部实力不强，可以先将其歼灭以解除主力的后顾之忧。

于是，后部红军停止前进，埋伏在青杠坡附近，又派出一部分兵力诱敌深入，而后突然开始攻击（典型的前四次反“围剿”时期打法）。

然而，川军出乎意料的强悍，在歼敌一小部后，局面竟然陷入僵持，整整一天下来都没什么进展，红军的增援部队在途中又屡遭失利。此时，川军追击部队后续的两个旅到达，另有两个旅由侧翼向红军移动开始夹击。



毛提议，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提出立即撤出战斗，放弃北上，转而西渡赤水河，而且是轻装行军，能扔的都扔掉。由于情况紧急，周朱等人同意后就立刻执行了。这就是“一渡赤水”。

中央分析，泸州地区敌军数量过多，要想北渡长江，最好在更上游的宜宾地区进行，于是红军继续西进，进攻叙永渴望得到休整、补给。

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已经放弃北渡长江，是想南下云南，于是派大军向川滇黔边界移动，有一部正好遇上正在围攻叙永的红军。

军委立刻决定撤出战斗，向川滇黔交界处转移，集结于扎西地区（今威信）。同时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



一直到现在，蒋介石都始终占据着上风，牢牢把握着战争局势。当时他判断红军放弃北渡长江是由于他知道自己已在长江边上集结了多少部队，认为红军不可能突破，而红军后来放弃渡江也是因为得知了这一情况。此时红军集结于川滇黔边界，正落入了他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于是滇军川军南北合围，凯申公志得意满，收网了!!!

可惜他算错了一点，红军放弃北渡长江后并不是想南下云南，现在的共产党内领导人已经不是李德了，军委确立的新战略是：

“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毛周王研究发现，黔北的敌军大都被调去守长江，应该趁此机会东进，杀回遵义附近。

当然，一贯的迷惑工作还是要做的，一个团的兵力被派出佯攻滇军拖住时间，主力红军偷偷东渡赤水河，于2月21日前后突然出现在黔北。

蒋介石惊呼“狡猾”，急电前线进行堵截，并判断，红军应当是想走老路——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红军集中兵力，于24日占领桐梓，并作出决议，趁敌不备，迅速攻克娄山关，进而夺取遵义再做休整。

娄山关号称坚不可摧，地势险而守军多。

26日晨，红军集中全部主力，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城。红军的打法有点拼命，正面强攻不说，侧翼面对敌军布下重兵防守的点金山直接爬山仰攻。国民党军队估计没见过这么打的，直接吓怂了，很快败退。

本来遵义方面已经派出援军，几乎是倾巢出动——娄山关没了遵义也就守不住了。但实在没想到队友这么渣，一天都没坚持下来，刚刚赶到就碰见溃败回来的友军，只好重新向遵义退却。



猪队友从来都不缺

见此情况，毛急令林彪率红1军团追击，争取在援军撤回城内前将其歼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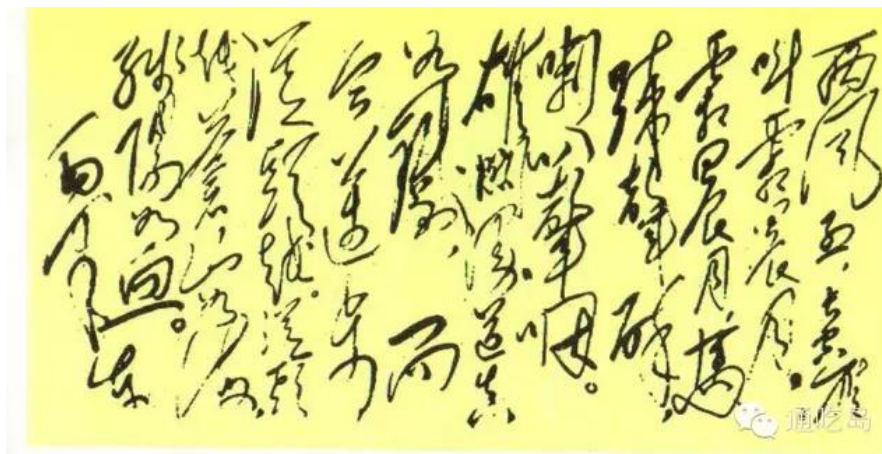
28日，红军重新占领遵义。

二渡赤水过程中，仅俘虏就捉到3000，收获可谓颇丰。

也就在当日，中央军委纵队离开娄山关向遵义进发，老毛回望险要的关隘，想到经历的种种，不禁百感交集：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毛泽东再次反对所有人，再次被撤职

要想了解真正的历史，必须了解它的细节。此时的红军虽然连连取胜，但是却充满隐忧。

隐忧在哪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娄山关一战，是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强行攻克了重兵把守的天险，但红军却也伤亡不小。到达遵义城后，彭德怀给中央写信：

“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对于这种情况，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分歧的，或者可以这么说，**老毛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观点是，面对这个问题，红军应该继续争取胜利，并在胜利之后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兵员物资等。而毛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的许多主要军事行动依然是不明智的，仍然是预定目标→坚决执行，并且为此打了很多攻坚战，比如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等等，毛并不觉得这对于红军而言是“胜利”，他依旧主张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战役。

但当时的军事行动是“集体决策”，一般是张闻天主持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二十余人举手表决，最后周恩来宣布决定，毛仅仅是周的军事助手，并不能主导大的战略方针。

这种分歧在红军入驻遵义 10 天后，终于爆发了出来。

当时军委的方针是这样的，大战略上，红军的目标是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最终和红四方面军、二六军团一起，使得云贵川黔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目前的军事行动是，以遵义为中心诱敌来攻，逐个击破，为将来的西进做准备。

很快，敌吴奇伟部上当受骗，为红军“运来”大批武器物资后仓惶逃走。



但是周浑元部固守鲁班场不出，3月5日，中央决定派朱毛为前敌司令部指挥，待机消灭周部。

3月10日，风云突变，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发来一封急电，建议军委改变命令，进攻打鼓新场。

朱德看后表示赞同，因为周浑元部一直据守不出，导致红一、三军团士气高昂却无仗可打。相反，打鼓新场守军较少，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且这里是红军西进必经之地，对根据地的建立意义重大。



毛反对，他认为，首先虽然打鼓新场驻军只有一个师，但它是一个固守据点，红军应当避免“啃硬的”；其次它距国民党主要部队驻军处都不远，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很可能正向打鼓新场方向集结，打鼓新场附近极有可能是蒋设的一个围歼红军的战场，因此如果进攻这里，我军可能会陷入重围。

但是这个临时建立的“前敌司令部”中，朱德是实际负责人，毛只有建议权。他看说服不了朱，就提议召开军委会议讨论。

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共近二十人参加，讨论结果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再次出现（大家数数，已经几次了），除老毛一人外，其他领导全部同意林彪的建议，改打打鼓新场。

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老毛之前不管想法再独特，再反对其他人，只要民主表决出结果，他都会予以执行，包括遵义会议后这段时间开会，他也一直是少数派，一直是命令执行者。而这次不一样，他放狠话：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凯丰一向对毛不满（之前讲过），也发怒了，“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也对毛发怒：“不干就不干了！”

毛：“好，不干了！”转身出门离去。

会议决定，采纳林彪建议，改打打鼓新场，并撤销毛泽东政委职务。

会议是凌晨开始清晨结束，毛想了一天，半夜三更的时候徒步六公里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二人夤夜长谈。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无从知晓，但谈话的结果是，凌晨时分重新召开会议，周恩来作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说服其他人，收回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毛也官复原职。

那么周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说服其余接近二十个与会者的呢？

没有记录，但就我的推断，是新情报。



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四十多年，周对毛的支持意义太大了

因为前一天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其他人认为，攻克打鼓新场可以打一胜仗，有利于之后根据地的建立。毛同意红军可以打赢这一场战役，但是他认为，根据之前情报，蒋介石的大批部队已经向这里移动，攻克后必须马上撤离，这种胜利在战略上毫无意义，反而耽误时间并令红军冒险。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攻克打鼓新场”是无须怀疑可以完成的。



但是这一天凌晨的会议撤销打鼓新场计划后，给林彪聂荣臻的解释是，国民党的援军与 12 号就开始陆续抵达打鼓新场，而我军最快也要 12 号才能赶到，因此这一战可能是打不下来的。

为什么我要啰里啰嗦强调这个呢？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此时红军高层并不是被毛的理由说服的，他们的军事政治理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多打胜仗”而后“建立黔北新苏区”。而林彪、朱德等领导认为打鼓新场可大的原因也是这两点，一是“可打胜仗”，而是“于建立根据地有利”。

但是毛对此一条都不同意，首先他认为“胜仗”并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其次他认为红军并不应该定下“建立黔北新苏区”的目标，正如长征初期博古李德不应该定下“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目标一样。红军目前过于弱小且并未甩开追兵，任何过于具体的战略目标的制定，都很容易引起敌军的针对性打击，因此红军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灵活机动，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随地制定新的战略方针。

这在后来红军的行动中得到证实，军委决定延续既定计划，进攻周浑元驻扎的鲁班新厂。毛当然是不赞同的，因为这里同样是一个据点，进攻它的目的无非是它比打鼓新场更容易取胜，而且对建立黔北根据地意义重大。但是这次他没有过激地反对，因为“鲁班新厂”不胜不会危及到红军生死，所以他执行命令，与朱德一起赴前线指挥战斗。

三渡赤水，密码破译对红军到底有多大帮助？

3 月 15 日，主攻仍然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队伍进行。对面的周浑元早已准备充分，不仅构筑了密集的要堡，还用藤条荆棘甚至地下竹签构筑工事（怎么有点像水浒传），所以虽然红军战斗力强，但毕竟是血肉之躯，在反复拉锯中损失惨重，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战斗从早上 8 点开始打响，一直持续到晚上 8 点，此时吴奇伟、郭勋祺两部已经逼近鲁班场，再不撤可能真的就完了。

军委下达命令，全军于晚 11 点撤出战斗，下一步决定袭击仁怀，寻机甩掉追兵。

次日红军主力到达茅台镇，并于 16 日晚至 17 日中午在这附近完成了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方向前进。



今日的茅台渡口

1935 年 3 月 17 日，这一天在史书上根本没留下什么印记，中央所有主要领导人的年谱全部把这天跳了过去，仿佛只是在简单地行军、休整。但是，事实上，这



一天发生了一件改变整个红军命运的事情，它的意义可能不亚于遵义会议。

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就驻扎在河边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陈福村。这种行为很罕见，渡河之后红军并未完全摆脱危险，正常的做法应当是分散队伍迅速行军，但是中央目前有一件事急需解决，片刻都等不得——军事领导问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遵义会议之前那一个“猴场会议”确立了红军的集体领导原则，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中央开会民主表决，这有效地解除了李德的军权。但是在集体领导这段时间以来，问题更是不少，二十余人决策，干什么的都有，搞军事的、经济的、宣传的、情报的等等，每次讨论半天再举个手，浪费时间延误战机不说，还常常出现外行压倒内行现象。尤其是近半个月打鼓新场风波和鲁班场战役，更是令红军险些覆灭，这令当时的领导人们感到，决策机制必须要变了。

张闻天更是自责，鲁班场战役的失利，其直接后果就是红军策划了这么久的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基本上宣告失败，他作为总书记，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于是，渡河后，一场会议在小村中的茅草房中召开了。

很可惜，我们并不知道会议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整个 17、18、19 三天的历史文件都少之又少，那正是红军最危急的时刻，行军十分匆忙，上又有飞机轰炸，即使有少量资料也大都在赶路过程中遗失或是毁于战火。

但是有一点，会议的结果，成立长征中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三人团，毛泽东从此真正地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

（关于三人团成立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录，能确定的只是在 10 日打鼓新场风波之后到 18 日决定四渡赤水之前，最初主流一般认为在 12 日，但这于逻辑上讲不通，新世纪以来争论逐渐增多，个人赞同的是孙果达教授的研究成果，即上文中提到的 3 月 17 日三渡赤水之后）

3 月 19 日前后，红军截获并破译蒋介石密电。

蒋介石并不清楚红军三渡赤水想要做什么，他认为可能是要重回四川北渡长江，于是就决定亲临贵阳督战指挥，并且命令部下在赤水一带设立碉堡阵，运用第五次“围剿”胜利经验，将红军全歼于此。



三十年代拍摄的赤水渡口

说实话，其实红军自己也不清楚三渡赤水的明确目的，红军在二渡赤水后定的战略是在黔北地区反复运动，交战并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这是红军的一贯做法。

所以，现在主流所宣传的攻打鲁班场、三渡、四渡是早就计划好的统一战略行动，鲁班场是佯攻为了迷惑敌军、



三渡是为了调动敌军，并且举出三渡时有意加固浮桥就是为四渡做准备等等其实并不正确，佯攻不可能损失那么惨重匆忙撤出战斗，而红军当时为了保证能够在黔北迅速地运动，过河时都要加固浮桥，也并不是怎样的特殊布置。

刚刚进入权力中心的老毛也在思索红军下一步的动向，待得看到这一封蒋公的电报，心有所感，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在他胸中展开——四渡赤水拉开了序幕。

这里顺便解答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许多同学都提到了目前的一种观点，多见于《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即四渡赤水的成功是由于红军破译了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首先我要说，这话的后半句基本正确，红军确实破译了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可以说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但是第二点我想说，这些报刊的编辑对于军事可谓一窍不通，甚至连即时战略类游戏都没玩过。

四渡赤水期间，国民党真正投入战斗的兵力保持在 20-30 万之间，而红军的战斗部队则在 2 万-3 万之间。以 war3 为例，给你 20 人口的一本部队，对手则有 200 人口（假如可以），还是二三本高科技兵种，更夸张的是，对手占据了全地图的所有矿，你连基地都没有只能靠掠夺来补充。好，现在给你地图全开，能赢吗？

事实上，红军掌握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密码是从 1933 年 8 月开始的，当时上海来的同志带来了国民党密码破译法，总部二局的战士们学会之后，从此对国民党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但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33 年 9 月，李德就正式成为军事顾问，他用这些情报打了胜仗吗？前三次反“围剿”是朱毛指挥的，并未破译密码，打过败仗吗？

不要说李德，讨论打鼓新场战役时，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和毛掌握的一模一样的情报，为什么只有毛一个人坚定地反对发动这次战役？不仅仅是打鼓新场，长征期间各种会议，毛总是少数派，难道他比别人多知道些什么吗？其实在那种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即使洞悉敌军行动，对大多数指挥者（包括朱德刘伯承这样十分优秀的指挥者）而言，更多的帮助也只能是在某几场战斗或是战役中取胜，真正在战略上的选择并不多。

况且，本来情报战就是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应该还记得，反“围剿”时，老毛为了搜集情报可以带兵上一线战场，多次为情报部门亲自制定纪律条文，甚至细致到“电台不用时必须把电键卸下交给警卫员携带”这种地步。

相比之下，对面的国民党部队就重视不够，就在我们下一章要讲到的 35 年 5 月，他们得知了密码被破译这件事，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
顺风耳——毛泽东为
侦察电台的题词



蒋介石还惊呼“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于是国军电台密码开始频繁更换，但是……每次总是很快被破译，并没起到太大的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对敌军电报密码的破译和掌握确实是红军四渡赤水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情报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使用情报的人。

我们回到正文。蒋介石准备踏上飞往贵阳飞机，这一次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可他恐怕还不知道，有一场好戏已经排练好在前边等着了。

演员的自我修养——四渡赤水与兵临贵阳

上一篇正讲到，得知蒋介石即将抵达贵阳的消息，一盘很大的棋逐渐展开了。

3月20日17时，总政治部下达命令：

“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野战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全党全军上下已经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这次作战行动如此重要，秘密、迅速，中下级军官只知道是向东走，到达赤水河边才接到渡河命令；而至于渡河之后要做什么，连各军团首长都不清楚，命令只说“寻求机动”。

21日、22日两天，红军陆续渡过赤水河，这就是四渡赤水。



一定注意这张图，下文会经常用到。中间南北走向的是赤水，北部东西走向的是金沙江（长江），南部东西走向的是湘江，东南角南北走向的那一条清水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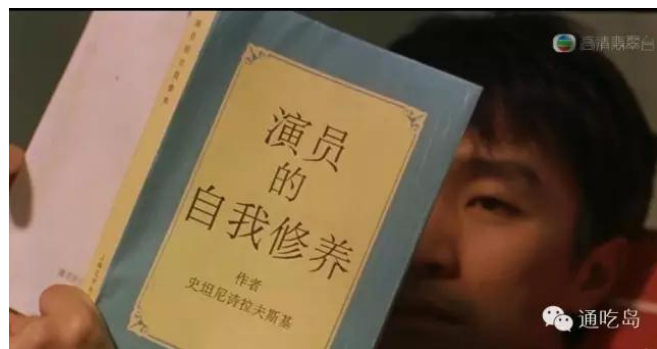


24日晚，蒋介石宋美龄飞抵贵阳。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早已被国民党的飞机侦查到，凯申也知道这一消息，但是他分析红军渡河之后的行军速度、方向等信息，做出如下判断：红军要重新进攻遵义，继续建立黔北根据地。但他还不敢确定，毕竟自己在贵阳，万一对方突然来搞一下，那可太危险了。

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形成，连接遵义仁怀组成防线，将红军消灭于防线以北。

怎么办？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下象棋，常常会谋划一个很大的“阴谋”，看对手一步一步坠入彀中，那感觉紧张、兴奋，血液开始往头上涌，手颤抖脚冰凉，呼吸也要变得急促，于是赶紧调整自己，变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时候，对方好像对这“阴谋”有所警觉，这时棋技不行就靠演技来凑，每当他走一步好棋我脸上就会露出轻蔑而又自信的，不易察觉但又能够恰好被他察觉到的微笑，而后假装克制自己平复心情，假装故作克制地走一步棋；当他继续回到陷阱，同样要有一系列不易察觉但又恰好能够被他察觉的微表情适时出现，在那一瞬间，惊慌懊悔痛惜无奈不甘等复杂的情感先后展现表现出来最后又交织在一起，最后马上故作克制，面部恢复出平静却又隐隐带着凝重的神情。具体的细节还有很多，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达到的结果就是，一旦对手走对了，就演得让他怀疑人生；一旦对手继续走错，就演得让他相信自己。这些影帝级别的表现帮我收获了许多胜利（吹个牛，见笑了）。



如今红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蒋介石已经有所警觉。

所以，准备就绪，表演开始：

首先，尽量在夜间行军。

白天行军时，军团分梯队行军，拉长队伍距离，让对手难以探清真正行军速度。

一旦被侦察机发现，全军立刻调转方向，假意向北运动。

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大摇大摆向东北方向进军，按中央要求“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成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



红九军团的军长是罗炳辉，政委何长工，他们的任务执行得非常棒——东进到白腊坎一带时，假意派部队调查经湄潭和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并且“不小心”被国民党知晓，蒋介石心中犯疑，红军莫不是要东渡回湘西，再次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而后九军团却又北上进攻国军，一副要杀回长江边的架势，持续吸引注意，总而言之十分抢戏。

3月28日，正当国民党部分全部目光都盯在北上的红九军团的时候，红军真正的主力悄悄穿越了仁怀到遵义间的封锁线，而后急速南下向乌江方向前进。

蒋介石这才惊觉——上当了，原来这里还有一支红军！但他依然不敢确定究竟哪个是主力，因此不敢动黔北堵截红九军团的部队，于是急令孙渡带领滇军从云贵边界赶来增援。但是当时的蒋介石还根本没想到红军那么大胆，直到3月30日红军来到乌江边，他都以为红军目的在于黔西（见地图），而并不认为红军是想南渡乌江进军他所在的贵阳。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打出口号“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凯申公这才惊出一身冷汗，再次急令孙渡飞速赶来救驾。

4月2日红军小部佯攻息烽，前锋却向贵阳东前进，成功避开滇军，又造成红军可能趁滇军调出云南空虚转而挺近云南的假象，令孙渡开始犹疑不决进退两难。

4月5日，红军突然兵临贵阳城下，蒋介石惊出第二身冷汗。然而，红军一边佯装准备攻城，另一边却派一小部东渡清水江，佯攻瓮安，仿佛要回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凯申公摸不着头脑，只好做了三手准备，一方面再次急令正在犹疑的孙渡部赶紧入驻贵阳护驾，另一方面叫湖南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堵截红军，最后做最坏打算，命令警卫“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此时，红军确定下一步目标——挺进云南。然而此时虽然云南兵力空虚，但敌我距离太近，若贸然行军，一旦出现阻碍滇军极有可能追上红军进行战斗。

必须把滇军调出贵阳城，离云南越远越好。

还得继续演戏！

滇军入驻贵阳后，红军**佯装**攻城几次，又**佯装**攻城失败，而后**佯装**无奈之下放弃攻城，最后**佯装**再次东渡清水河，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孙渡果然被骗，以为红军攻城失败军心大乱，再加上要渡河，可以尾随红军趁其渡河期间展开进攻，捡个大便宜。他立功心切，主动请命蒋介石追击，获准。



出兵后发现，特么又被骗了，红军渡河只是一小部的佯攻，真正的主力走了一半就开始掉头转向贵阳，正碰上孙渡的追击部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混乱中险些被捉。

孙渡还惊魂未定，身在贵阳的蒋介石惊出第三身冷汗，他万万没想到红军竟然再次兵临贵阳。我的轿子和马呢？准备撤！



然而，这冷汗还没来得及擦干凯申公就发现，赧被骗了，这次攻城竟然赧是佯攻，真正的红军主力已经绕过贵阳急速向西南行军，往云南方向去了。



跳出重围



自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层以来，红军的战略就是一个字：“走”。四渡赤水是走，兵临贵阳是走，这一章更是通篇在走：佯攻昆明、渡金沙江、穿越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这段时间有军事斗争也有政治斗争，有同人的斗争也有同自然的斗争，但所有的故事都紧紧围绕在这个“走”字上。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金沙江——“巧渡”还是“险渡”？

上一讲说到，红军南下乌江、奇袭贵阳、调动滇军，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之精彩足以写入教科书。但凡事皆有两面性，红军的战略得以实施是建立在超高机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在云贵高原上如此奔波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大的考验。更糟糕的是，红军自身并无任何生产力，其物资获取只有两种办法：

- 1.缴获。前提是与敌军开战并将其歼灭。
- 2.征、借或是打土豪。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在某地区有一定时间的停留休整，因为这些活动都要耽误不少时间。

很不幸的是，在老毛指挥红军转战的这近一个月里，两种办法实现的机会都极少。毛极为强调机动性以调动敌军，自三渡赤水以来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正面交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缴获，同时更不可能在某地长时间停留，征借到的物资因此少之又少。

此时，红军虽然已经骗开追兵向云南方向进军，但蒋介石立刻命令当地集结的湘军、滇军以及周浑元部紧追红军。其实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并不会去云南，应当仅仅是去到贵州西部活动，择机渡江。他这么想是极有道理的——红军的物资和体力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进行如此长途的跋涉。

为此，蒋介石制定了十分针对的战术——追兵分三路在红军两侧、后方，像牛皮糖一样贴在不远处并遥相呼应，将其驱赶并断其后路，同时当红军企图掉头作战时又要及时避开，等待其余部队集合。



红军走过的贵州山路

这可苦了红军了。为了抢在追兵之前抵达目的地，红军不得不以每天 100 里的速度行军，而且是在贵州的高海拔山地。大家自己可以想象，每天跑 5 万米，身上还有负重，脚上还是草鞋，走的是山路……

虽然红军战士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以其顽强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冲出贵州神速进入云南，完全超出蒋介石的想象，但是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内部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军事方面，非战斗减员数量大增，许多战士由于疲惫、疾病而掉队或是牺牲，在贵州转战的这一个月里，非战斗减员数量达到 7000 人。各类文学作品中常常描绘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冰雪、沼泽、缺衣少食等等，但事实上贵州的这段时间艰难程度绝不下于它们，因为雪山草地虽然条件更加恶劣，但是那时已经渡过金沙江跳出包围圈，无论心理上还是实际的行军都没那么紧张，可是此时的红军却是三面追兵，一个不留神就可能被包饺子，压力非常大。



第二，更关键的，政治方面，红军内部出现了政治风波，刚进入权力核心不久的毛泽东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中央的张闻天王稼祥到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等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不满。



红军长征时穿的草鞋

4月23日，红军进入云南曲靖地区，三路追兵依然穷追不舍，由于长时间行军又得不到补给，底层战士们怨言很大。中央决定必须要寻敌作战，打击追兵，既是为了争取休整时间，也是为下一步军事活动扫清后顾之忧。

中央于是下达寻机消灭曲靖、马龙之敌的命令。半小时后，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发来回电，提出建议的同时隐晦地表达了对中央近期行动的不满：

“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25日，军委决定先消灭尾随之敌，而后进攻白水曲靖地区。前线的林彪聂荣臻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据前线的情况认为，敌追兵兵力很强且相互之间成犄角之势，云南地区地势狭小多山水，我军在此条件下难以回旋，即使取得一些胜利也没太大好处反而容易陷入重围。他们的建议是，少走弯路，以最快速度占领东川，从那里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前线的彭德怀也不同意打击追兵，理由类似。

军委接受建议，放弃回击计划，但是并未采纳占领东川以求渡江的建议，而是继续西进，迅速攻打白水、曲靖、沾益、马龙。

行军途中缴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二十余份军用地图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等特产，这对彼时的红军来讲绝对是雪中送炭。

4月27日，红军占领沾益、马龙，直逼昆明。

其实蒋介石并不认为红军会占领昆明，或者说他觉得即使占领也无所谓——还能借此机会削弱一下滇军，他所担心的只是红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可是滇军首领龙云就不是这么想了，顺带说一句，龙云是彝族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后来又担任校长，也算是朱总司令的校友，军事上还是很在行的。

4月28日，蒋介石电令龙云将兵力调动，封锁金沙江，重点是龙街渡口（如图最西部，又称金沙渡）。

4月29日，红一、红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几乎已经是兵临昆明城下。虽然蒋介石一再命令集中部队于金沙江畔各个渡口而不要固守云南，可是龙云哪还能顾得了那么多，急令部队收缩于昆明，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于是，滇北到金沙江沿岸的守军就大大减少，红军北上渡江路途中的压力也因此极大地减小。

同日，军委下发指示，说明了云贵地区情况的恶劣，决定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这是近几个月以来基层部队第一次收到明确的行军指令，士气也为一振。

同时，具体渡江计划也得到明确布置：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在刘伯承、林彪、彭德怀的指挥下，从皎平渡、龙街渡口、洪门渡口分三路渡江。



5月3日，抢占皎平渡成功，4、5两日，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另外两路红军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现在龙街渡口仍留有当年红军的宣传标语，长征真的是“播种机”

4日，红一军团先锋到达龙街渡口，却发现渡船已经被川军拉到北岸。

龙街渡口不比较平渡，一直就是蒋介石重点布防对象，追兵很紧，天上又有敌机侦查骚扰。无奈之下，作为先锋的一师只好借来门板等材料架设浮桥，没想到水流太急，还没到河中央桥就支撑不住了。

这时国民党万耀煌部的追兵已经到达昆明，离红军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红一军团其余部队也临近渡口，如果大部队集中在江边无法渡过的话，将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林彪急了，在电话中怒斥一师师长李聚奎，李当然也急了，他们师再英勇也不可

能左右江水的流动情况啊，他向林彪建议，能否请使军委，转到皎平渡渡江。

随后，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相似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遇到这个问题。

皎平渡是个很小的渡口，根本不可能让红军主力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江，且在红军由龙街向皎平渡行军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敌兵拦腰截断。这个选择也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红军将无法渡江，牺牲于金沙江以南。

在此危急存亡的时刻，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次拯救了红军——追兵的先锋万耀煌部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单独追缴红军，于是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说前方并未发现红军，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而后原路返回与友军汇合，一起进剿其他方向的共军。这为红军赢得了珍贵的四天渡江时间。



皎平渡现在已经架起大桥

更重要的是，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译出。

朱毛周等中央领导终于松了一口气，接到林聂电报后，同意其转到皎平渡渡江，但务必在 7 日赶到以防被拦腰截断。

当时已是黄昏，林聂部队接到回复后立即出发沿江向东。据聂荣臻回忆：

“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 48 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 120 里地，疲劳极了。”

120 里地，6 万米，也就是一个全马加一个半马，负重，夜路，草鞋，这路不是跑道也不是公路，而是急流中的大石块。

这究竟是一只怎样的军队。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老电影里说，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可即使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也有受不了的时候。

在读博古李德领导红军长征段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他们“死脑筋”，一心只想和红二六军团汇合，因此那套路被国民党摸得清清楚楚。其实他们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脱离根据地的日子太苦了，基本上每天都在行军，没有持续的补给吃了上顿没下顿，四周围都是敌人还常常遇到侦查的敌机，真是提心吊胆，睡觉都不踏实。



另一方面，由于长征本身并无明确的目的地，再加上敌情不断变化，所以朝令夕改的事情很常见。战士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也不知道要走多久，只是跟着命令盲目地走来走去。其实累并不可怕，只要有目标就有盼头，有盼头就有力量和勇气（怎么有点像鸡汤……），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累。

而以上两点状况在四渡赤水到渡过金沙江这两个月里被无限放大。

后来教科书上讲起那段历史必然是令人眉飞色舞的：四渡赤水让敌军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真实意图，兵临贵阳吓尿蒋介石调出滇军，奇袭昆明抽空滇北军队，又北上巧渡金沙江彻底甩开国民党追兵。

但事实上，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高级军官，那段时期都是极为痛苦的。当时大家的想法一样，最好的消息是建立根据地，其次是原地休整，再次是与敌军开战，最不愿意听到的命令就是行军。每天走来走去，昨天刚过了赤水，今天又接到命令要回去，明明说的去昆明，刚看见城门突然又掉头北上，很多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是写实，不是夸张）。死在战场上好歹血性、光荣，而这两个月，大部分牺牲的战士都是非战斗减员，真是令人憋屈。

1939年5月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

5月11日，林彪军团到达会理城外休整。憋了一肚子火的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主要领导的面，大声讲道：

“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了。

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他不讲组织纪律，有不满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提出来。

随后，林彪给周毛朱三人写了一封长信，部分如下：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而后请在场领导联名签字。由于无人愿意签字，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件发出。

之前已经有很多军官反映前线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对宁走路不打仗、走弯路不走直路的不理解，再加上林彪这一封火药味如此浓烈的信，毛周等人感到，召开一场解决现阶段思想问题的会议已经是刻不容缓。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城郊外召开，史称“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毛泽东与林彪“弓背”“弓弦”之争

其实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渡过金沙江，但仍然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彭德怀攻打会理城连续三日而不下，部队无法前进只能驻扎于郊外；国民党军队已重新集结抵达江边准备渡江，四川境内的敌军（杨森、刘文辉等）在前方做好防御准备并且派兵赶来。

但是毛、周等中央领导知道，此时红军内部已经出现问题，拖得越久伤害越大，必须尽快解决。现在虽然仍处在危险之中，但是追兵数量庞大，在渡船稀少的情况之下想要渡河仍需 3-5 天，而前方的川军为保存实力也不会贸然单独出击。所以一定要趁此机会，抓紧时间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

会理会议虽然远没有遵义会议知名，但它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老毛在党内地位的稳固意义非凡。很可惜，与很多长征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一样，此次会议没有会议记录，另外回忆录提及的也很少，所以只能还原个大概：

与会人员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前线的红 1 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和红 3 军团负责人彭德怀、杨尚昆（红五军团的董振堂是否参加存疑）。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会理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右边坐着的是毛泽东和朱德，后面站着周恩来和陈云，左边三人为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问题，对于他这种宁走不打，宁走弯路不走直路的打法，全军上下很多人颇有微词，中央就是以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代表，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三人团成员，大家可以

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会议一开始，张闻天作为主持就让王稼祥先讲，说说他听到的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王稼祥推了一下，让张闻天先讲（真是套路啊），于是张就把这种对长时间走而不打的疑惑讲了出来，请大家讨论。

而后彭德怀发言，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应当尽量避免走弯路，避免长时间疲劳行军。

然后林彪发言，一样，认为应当避免走“弓背路”，要走弓弦。

老毛越听越怒。

现在我们知道，毛的打法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张闻天王稼祥不懂军事也就罢了，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彭德怀和林彪当时也不能理解呢？莫非他们的军事水平比毛差得很远吗？



其实他们的分析过程并没有错，他们理解不了毛指挥的原因在于，毛掌握了许多他们并不知道的信息。

当时军委下辖一个“二局”，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他们破译了国民党军队所使用的密码，这带来的后果是，国军的许多作战行动都为红军所知晓，也正因此，毛主席能够指挥红军避开敌方主力，在云贵川之间来回穿梭。

但是这件事情只有中央少数高层才知道（除三人团和朱德张闻天博古李德外还有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曾希圣、王诤），前线的指挥员是不知晓的——这种事情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长征胜利后军委二局部分同志的合影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彭德怀林彪对于毛的不理解，所以他们会问，明明可以直走过去为什么要绕圈子？毛多么想回答，因为直线上面有敌军啊！

所以林彪又会问直线上敌军数量不多，为什么非要绕开而不采取小部监视掩护主力红军迅速通过的办法？毛多么想回答，因为附近的敌军正在朝这个方向集结支援啊！

但是他不能回答，一旦回复被敌军知晓，那红军很可能陷入危险。这并不是说林彪彭德怀得到情报后会做出和毛相同的指挥决策（因为密码早在毛上台之前就被破译了，当时的领导也没像他这么打，毛在破译密码前也是这么个套路，多走少打），而是说起码他们会理解毛指挥的意图，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没头苍蝇，来回乱走。

（关于情报对于战局影响的问题前文已经写到了，在此不重复）

老毛心里苦啊——好不容易开始指挥军事，屡出奇招帮助红军逐步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结果却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和两大前线将领的质疑，然后由于保密原因自己还不能解释。

可仅仅是不为某些前线和后方同志理解也并不值得发怒，毕竟前线指挥不知道破译的事，后方某些领导人不是军事干部，都可以理解。毛真正发怒的原因是，他认为林彪这封信是张闻天联合彭德怀指使他写的。

虽然林彪与毛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争执，有时还很严重，但是毛不能相信他一个前线指挥能够在信中直接写“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这应该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他这么做，那段时间恰巧张闻天是和三军团一起行军的，而原来质疑走路过多的中央领导主要就是张闻天——这也太巧合了。

对彭德怀的怀疑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林彪这信里面提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彭是林的同级，他们一直是负责具体战役指挥，因此这种提议有些让人莫名其妙。其次，林彪写信前和彭德怀通过气（这个毛知道），彭德怀虽然口头上批评了林彪，但是并未制止他寄信给中央，也未向中央汇报，这也可疑。第三，对于毛泽东走弯路不走直路的质疑最早就是彭德怀他们红三军团发出的，早在二渡赤水的时候，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当时担任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就联名给中央反映了这种质疑。

综上考虑，彭德怀对军委的指挥也是有不满意的，他其实是同意林彪在信中有关军事的论述的，彭仅仅是不同意林彪处理这件事的方式。

果然，在会上当毛指出林的信是彭鼓动写的，彭否认以后解释的原因只是“遵义会议才选出的新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并未讲军事上的原因。反思军事上的认识错误的时候（自我批评是开会的一个正常环节，不是特别针对谁），他仅仅讲到鲁班场战役的反思，只字未提“弓背弓弦”问题。

毛是满腔怒火啊，本来遵义会议以来他性格变了好多，力求团结大多数，可现在实在忍不了了，又开始批判在座诸位，说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个啥”，说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革命战争”（哎，这两个批评好押韵啊）。

随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知情领导人站出来力挺老毛，认为他的军事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发言，基本都表达了对林彪事件的批评，表示要支持中央的决策。

最后，张闻天作总结，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主要在5月12日召开，但其实断断续续延续了三天，毛和张应当在私下里有交流）

在会理会议召开的同时，前线的红三军团一直在围攻会理，可惜迟迟打不进去。为什么要打会理城呢？个人认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红军自渡赤水开始就一直在行军，没有攻下任何一座城池，粮食弹药得不到有效补给十分匮乏，若能打下会理城，则对红军而言是一次很好的补充。

第二，应该是老毛有意为之。因为当时军中厌倦走希望打的呼声越来越高，你们要打，那咱们就看看打的效果到底如何，红军究竟是否具备打的实力，同时还能趁此停留的机会召开会议解决思想问题。

所以毛对彭的指示是：



最好能打下会理城，实在拿不下来，就把他们困在城里，别让他们出城来打搅我们（开会）。



会理城十分坚固，战役开始前川军已经将周围民房全部焚烧，坚壁清野

而彭德怀的回应是：
遵义城都打下来了，还能打不下会理城？

果然没打下来。敌军远比彭想象的顽强，红军又缺少重武器，从5月9日一直打到5月14日都未见成效。

5月14日，会理会议正式结束。

5月15日，红军放弃进攻会理城，继续走“弓背”，由红三军团一部掩护，主力部队绕过会理城，迅速北上向西昌方向前进。

5月18日，正当西昌守军心情忐忑严阵以待之时，红军绕过西昌城，直奔大渡河去了。

跋山涉水来看你——从彝海结盟到强渡大渡河

此时的红军可以说短暂地脱离了危险状态，可是仍处于危机之中——想彻底摆脱追兵就得北上，想北上就得渡过大渡河，且不说大渡河是出了名的险，目前红军能否顺利到达大渡河畔都是个未知数。去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是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而是从冕宁到安顺场渡河。

5月19日，军委派刘伯承聂荣臻率部作为先遣队打探情况。调查结果不容乐观：第一条路已经被国民党派重兵堵死，硬闯的话造成伤亡不说，更重要的是耽误时间，后面追兵一来就会被包饺子；第二条路虽然并无堵截，但情况可能比第一条还糟糕，那是彝族聚居区，道路崎岖难走容易迷路，且当地彝民势力很大，常常截掳附近居民和往来人员，国民党的的小股部队已经多次被他们袭击缴械，以致有命令团以下编制的队伍不允许单独接近该地区。

没办法，第一条路肯定完蛋，第二条或许还有机会，于是军委决定，通过彝区。

5月22日，刘伯承所率先遣部队进入拖乌，刚开始非常和谐太平，没遇到任何阻力。正当指挥官们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后面枪响了。原来，工兵连因为携带了一些设备行军较慢，稍微掉队了一段，然后就被突然杀出的彝族武装缴去枪械夺走所有物资，连所有士兵的衣服裤子都被扒了个干净……

但是，老毛和朱老总在临行之前反复叮嘱刘聂二人，一定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只



做宣传工作决不开枪，所以，那支工兵连的指导员一边被扒衣服一边还大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没办法，继续走吧。

行至喇嘛房附近的时候先头部队也受到了许多零星的攻击试探，略有伤亡。部队继续前行到达彝海，情况出现了，当地三个主要部落的彝族部落从三面包围了红军，想要进行缴械和抢夺。

司令刘伯承命令布置阵地准备防御，政委聂荣臻命令继续喊话宣传，没半点效果，很多战士疑惑了——TM 对方是不是听不懂汉语？

双方不断僵持，太阳渐渐西斜，如果不能天黑前跳出包围那红军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刘伯承下令，进行反击。

当然，这种反击主要是威慑，战士们用大炮、机枪在射程范围外进行射击，掩护 6 名战士武装泅渡过彝海，而后战士们用冲锋枪向山顶射击。

这可把对方吓了一跳——彝民大都没见过大炮、机枪、武装泅渡这种现代战争中的东西，很多人认为这是天神而不敢进攻，各部落看到捞不着便宜就退了开去。

不久后，其中一个部落“沽基”的首领小叶丹派使者找到红军交涉。红军反复声明自己的主张，自己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青面獠牙”的恶魔，只为北上路过这里，绝不会侵犯彝族各部落的利益。当地处于川军的统治区域内，汉彝矛盾很尖锐，汉族人瞧不起他们所以称其为“夷族”（改称“彝族”是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提议，他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讲，“夷”有歧视的意味，而“彝”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正应了彝族喜欢喝酒的传统，这个字中间有“米”还有“彡”（绞丝），象征你们族丰衣足食），极尽压迫，彝族部落对于汉族也是极尽劫掠，此时红军却向对方一再强调自己“民族平等”的主张，认为应当让“彝族管理彝族”，各民族都是骨肉至亲，应当共同反抗反动军阀的统治，由此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和信任。

当时主管宣传的肖华（后来兰州军区政委）适时地提出，我军司令刘伯承可以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使者于是离开回报。

不久后，小叶丹亲自带人下山，与刘伯承二人在彝海之畔以湖水代酒，歃血为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

“彝海结盟”被传为佳话，曾经被拍成电影，很多历史节目也频频提及，就在去年，以此为名的一部电视剧还刚刚杀青，足见这个故事的影响力之大。



附图 5：武装泅渡琼州海峡现场照片。1965 年国庆前夕，两栖侦察队在黄信雄排长的带领下，九勇士编队武装泅渡琼州海峡的情景

武装泅渡一向是我军强项，1965 年 9 名战士背着手枪、子弹、手榴弹、匕首、水壶、鸡蛋等共十多斤的物品，武装泅渡琼州海峡，耗时 8.5 小时，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





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宣传的迷雾就会看到，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的浪漫气息，反而夹杂着许多现实的利益的因素在里面。

当时国民党对于彝区的统治政策延续了清末以来的“坐质换班”制，就是各部落首领轮流到冕宁县城做人质，以此来保证附近地区的基本稳定。得闻红军马上就要打来，守城的李德吾一团要撤退，就把彝族人质一起带走。

彝族人当然不干了，本来他们部落内部还在打斗，听闻这个消息后立刻搁置争议一致对外，联合起来在路上打败了李德吾那一团，救回头领人质并进行缴械。

这应该是整个彝部罕有的大收获，一共有大几百条枪。实力一增强，他们就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劫掠，将周围汉族区的物资夺了个遍还掳去大量平民做奴隶。这时红军就到了。

彝族部落的首领并分不清红军白军，只知道有一股部队到来，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以为是前面李德吾部的落单部队，于是就再次埋伏起来意图继续抢枪，这才有了这次交火。当发现这是一只战斗力极强的正规部队时，各部落立刻逃离，因为以之前的经验来看，从清政府到川军，常常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性回击，一旦抵抗就是屠杀。

小叶丹之所以没逃走反而派使者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的部落就在这旁边，不可能离开，所以它来的目的应该是照旧来投降归顺（暂时的），然后询问上交多少东西才能够避免被屠杀，没想到红军非但不杀人不要东西，还宣扬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并且还要和他结拜兄弟——这令小叶丹喜出望外。



图为小叶丹妻子。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遭罗洪部的人伏击而死。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见到刘伯承后他提出的请求是，能不能让红军帮他攻打另一个部落罗洪，其实仍然是归顺的意思，类似于古代的藩属国请求宗主国发兵。红军拒绝提议又反复强调，民族内部不要争斗，共同的敌人是川军刘文辉，所以又请来罗洪部的首领大家一起喝酒聊天。

可红军宣传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天的时间内如此巨大地转变延续了几百上千年的观念，刘伯承还是赠送了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子给小叶丹并封其为小队长。

随后，小叶丹派出向导，指引并且护送红军走出彝区。

5月24日，主力红军陆续穿过彝区，当晚先遣部队红



一团继续前行到达大渡河渡口安顺场附近，该地有敌军一营把守。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先派一小部队到下游佯攻使敌放松警惕，后突率主力偷袭占领安顺场。之所以在优势兵力下还选择突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将毫无防备的敌军迅速击溃，防止其烧毁物资尤其是渡船。

然而一团搜寻整个渡口，仅发现一条船。

怎么办？



石达开遭受凌迟时的照片

1863 年，同样也是 5 月份，翼王石达开陷于此地，多次派兵强渡大渡河全部失败，常常是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渡河队伍在河中全军覆没。无路又无粮的情况下，石达开曾给清军写信“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希望投降自刎以换三军之活命，没想到最终不仅自己被凌迟，其部队也被清军全部屠杀，年仅 33 岁¹。

现在仅仅过去 72 年，大渡河边甚至还有当年亲眼见证太平军全军覆没惨状的老人，他能清楚地回忆起幼年时看到的恐怖景象：汹涌的河水被染得通红，太平军被抛尸河中，到处都漂浮着尸体。

所幸红军此时的境况要好于太平军当年。

当年的石达开在渡河前不久由于夫人生产全军庆祝三天而贻误了重要战机，导致清军烧毁船只且大部队援军到达对岸部防。如今红军行军神速，不仅迅速占领渡口，对岸川军大部队仍在路上，只有一个营把守且战斗力较弱。

必须把握时机。

一团挑选出 17 名战士作为渡河的突击队。虽然渡船最多可容纳 40 人，但是考虑到各种武器的携带、河水之险和船只质量所以最终 17 人分两批渡过。岸上则集中所有炮火向对面打击，为突击队作掩护。

25 日临近中午时，突击队渡河成功，川军根本无心恋战，退向成都方向，安顺场渡口彻底为红



红军渡河用过的旧木船

¹ 石达开凌迟处死的时候留下了一组照片，这里选了其中一张，已经过打码处理。原图实在过于血腥残忍，极易引起人的不适，先割生殖器，然后是胸部和髌骨，期间还要以烙铁烙烫防止昏迷。如果你已经看过多部欧美血腥恐怖电影，相信自己的耐受能力，可以自行搜索完整版无码套图，后果自负



军所控制。

此时，困难再次出现——大渡河水流湍急，无法架起浮桥，渡口附近除了这艘渡船外就只找到几条小木船，要想靠这些船把红军送过河可能要接近一个月。

朱毛等军委领导商议后决定，红一师继续渡河，其余部队北上由泸定桥渡河。

27日早，王开湘和杨成武所率的第四团作为先遣队向泸定桥进军，川军的援军也正火速赶去，一场长达160公里的负重障碍越野比赛开始了。

翻译翻译什么叫“信仰”——飞夺泸定桥与翻越夹金山

上一章讲到，军委决定分兵泸定桥渡河，由王开湘和杨成武所率的第四团作为先遣队夺桥，与此同时川军的援军也正火速赶去。

安顺场到泸定桥全长是160公里，军委命令三天赶到，也就是说每天要行军50公里以上。这种速度对于已经历过数月长征洗礼的红军来说并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初所担心的是遇到国民党部队的阻截耽误时间，于是王杨二人决定走小路抄近道。

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小路崎岖难走多河多山，让红军反而绕远了不少，更恼火的是路上接连遭遇两支敌军队伍，虽说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有不少缴获，但这次任务是赶时间。

第一天仅行军40公里。

第二天一早接到军委消息：限明天夺取泸定桥。

是夺取。

也就是说，明天一早就必须赶到。

也就是说，还有24小时，需要行军120公里。

红军之前的行军记录是一昼夜80公里，第四团必须创造奇迹。

各党支部开紧急动员会，一群人聚成一团，一边行军一边开，开完就散开。

前方关口发现敌军，不停止，不打阵地战，借着大雾偷偷摸近敌军，直接手榴弹加刺刀击溃。

桥被炸毁水流湍急，修桥，其他人趁机休息，之后继续急行军。



晚上七点，已经过去 13 小时，行军 70 公里。

天公不作美，突然乌云密布下起瓢泼大雨。

本来路就难走，现在更是又滑又泥，原本能轻易趟过的小河也变得水流湍急起来。

红军战士又累又饿，有的人走着走着竟然可以睡着，稍打个迷糊可能会滑到河里。

没办法，军委命令大家解下绑腿，结成一条长绳，连在一起拉着前进。

24 小时过去了，早上六点，王开湘杨成武率领部队到达泸定桥西岸。

敌军根本没想到红军会来的这么快，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把西岸阵地拱手相让。

这边，王开湘杨成武等人在一个天主教堂里紧张地召开会议商讨夺桥问题。

那边的敌军更加紧张——他们兵力不够啊！本来在泸定桥驻扎的部队总数就只有两个旅，红军竟然从东西两岸分别进军，两岸路上都要设防，这导致现在泸定桥守军只剩下 38 团大部，没多少重型武器，弹药也不足。

川军这边确实安排了大量的援军，但红军来得实在太快，那些每天抽大烟的兵痞子根本没赶到，连个影子都没有。

所以，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战斗一开始红军竟然对敌人进行了火力压制——四团集中所有炮火，为 22 名突击队进行掩护。



今日泸定桥俯视与仰视

对面守军叫苦不迭，人少、弹药不足、没重武器，怎么搞得好像我们是共产党，他们成了国军。而且由于红军来得太快，他们甚至连泸定桥板都没拆完……

眼看 22 名突击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边铺木板边摇晃着前进，敌军赶紧放火烧桥。

为时已晚，突击队冲上岸，后面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三连也跟了上来，紧接着全军渡过泸定桥。

东岸敌军无心抵抗，弃工事而走，泸定城很快也被攻克，22 名突击队员仅仅牺牲 3 人。

当晚，从安顺场渡河的东岸红军先头部



队，红一师第三团也到达泸定桥，两岸彻底为红军所占领。

5月31日，毛周朱张王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渡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泸定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相关记录也并不多，主要就是讨论了红军之后的行动方向——维持之前的决定，继续寻找红四方面军与之汇合，并且确定大致行军路线，避开人烟稠密区，向北翻越雪山。

6月2日，全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军委传令放弃攻取清溪、荣经，向雪山方向前进。果然，虽然途经环境险恶的二郎山，但附近驻扎的川军为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正面交锋，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一些骚扰。

6月9日，仍然是杨成武王开湘所率红四团作为前卫团率先到达夹金山脚下的宝应县城，6月12日，开始翻越雪山。

有关过雪山的叙述、回忆太多了。首先要明确一点，红军翻越的雪山不止一座，而且三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所翻越雪山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二方面军（当时叫红二六军团）。



三路红军长征路线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 5 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



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闹分裂的问题，所翻越雪山数量更多，且夹金山、梦笔山都是两次经过。

一般大家提到中央红军“过雪山”主要指过夹金山，流传的故事、回忆录也以这个为主。这主要是由于它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没有经验，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没准备，所以遇到的困难最大，给大家的震撼也最大。

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经过华南、西南地区到达四川，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南方人，抗寒能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一路行军打仗缺少给养物资，许多人穿着单衣，用起满血泡的脚踩着自制的简陋草鞋就走上雪山。

这种情况下，红军准备了大量的辣椒生姜和烧酒进行御寒，冷了就吃一口辣椒，有战士晕倒了炊事班立刻赶过来灌辣椒水。

出发前反复强调过雪山时不能停下太久，尤其不能坐下。但真翻越到海拔较高处时，很多战士支持不住想坐下休息，这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成了一个雪堆。

坚持行军的战士们也大都是浑身发僵，一不留神滑倒根本都没法挣扎，直接顺着雪崖滑下山去。

晚上红军在山谷雪洞里休息，三五人一伙背靠着就露营睡觉。第二天改行军时就发现自己背靠的人已经僵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本来先过雪山的队伍会留下纸条做路标，后来发现根本不用，后面的队伍只需要沿着尸体走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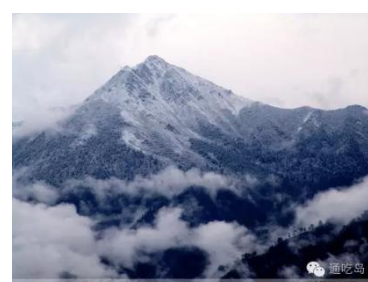
恶劣的环境、简陋的装备，红军战士们为什么能够以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这些困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本科专业是“工商管理”，《管理学原理》的第一堂课上老师留给大家的思考题就是“胡萝卜+大棒”理论，认为企业一般运用的激励方式有两种，胡萝卜（奖励）+大棒（惩罚），也就是正激励加负激励，这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创立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



“Carrot and stick”诞生于《经济学人》，后来甚至写入牛津词典。它的最初来源是一则古老的谚语：

“dangling a carrot in front of a mule and holding a stick behind it.”（要使骡子前进，就在它前面放一个胡萝卜同时用一根棒子在后面赶它。）



今日的夹金山。当年气候远远比现在恶劣得多。



红军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际执行者，军饷制，有赏有罚。

直到毛泽东出现。

他认为人不是骡子，哪怕在管理中也不能简化成骡子（经济人）看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有着独特思想的个体。

于是有了三湾改编，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决策。

毛推动废除薪俸制，军官和士兵一样不发钱，胡萝卜没了。

毛推动禁止军官打骂士兵，强调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官兵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工作不同罢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大棒也没了。

其中阻力有多大这篇文章就不多提了，总之，从朱总司令和毛委员做起，军官与士兵吃穿用都一样，精神上也完全平等。

红军就这样完成了脱胎换骨。

过雪山时是怎么体现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本来配有马或骡子当坐骑，也可以坐担架，但他们把这些全部让给伤员，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都是徒步翻越的雪山。

聂荣臻本来因病坐担架，后来把担架让给左权，带病徒步走过雪山。

夜晚前行至海拔较低温度较高的山谷，红军战士们疲精疲力竭坐下休息，准备第二天翻越最后一个山头。朱老总仍然像往常一样四处巡视。

周总理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伤员，哄他说“你坐担架我骑马，不是一样吗”，送走他之后又把马让给了其他伤员。下山后自己就开始咳嗽，8月过草地时高烧多日昏迷不醒（电视剧“陈赓大将”也曾描述过这一事件，陈赓想尽办法从背阴处挖到一块冰给周恩来退烧）。经诊断患了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

红军普通战士们也是同样的伟大。

本来中央命令炊事班轻装，只带过雪山所需 1-2 天食物即可。可炊事员们为大家着想，粮食、行军锅、生姜、辣椒、干柴，都是负重五六十斤，有人甚至超过七十斤。

担架员们不仅负责运送伤员过雪山，同时有同志晕倒掉队还要把他们运下山去，再回来追赶队伍，一趟一趟地跑。



过雪山时，反而这些后勤人员牺牲得最多。

现在很多人想抹黑当初那一代领导人，乃至抹黑整个红军的历史，但我想说的是，

“跟我上！”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她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激励我们在追求公平和真理的复兴道路上不断奋进。



红军用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等一系列人类无法完成的行动，生动翻译了了：什么 TMD 叫信仰，什么 TMD 叫 TMD 信仰！

6月17日晚，红军翻越过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在维镇顺利会师并召开联欢会。但这热闹与团结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张国焘正准备从茂县赶来，两河口会议即将开始，矛盾马上就要爆发了。

长征终章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分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二者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对于后者，不能采用强制的压服的手段，而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

长征的最后这段时期，红军已然跳出了包围圈，虽然也有对敌斗争（如包座战斗），也有恶劣的自然环境（过草地），但最大的考验还是解决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有权力的争夺，也有思想路线的差异，但最核心的节点在张国焘身上。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从两河口到芦花：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初次交锋

上一篇讲到，中央红军翻越过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在维镇顺利会师并召开联欢会，两军开始讨论红军下一步的战略。

在中央红军进入四川、渡过金沙江之前，所拟定的战略一直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西根据地。比如奇袭昆明之后的《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上图为当年的懋功，下图为如今的懋功。“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此言着实不虚。

但是随着红军深入四川，发现川西地区土壤贫瘠人烟稀少，而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文化也不通，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以图长远发展。

（分析原文：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

于是中央逐渐改变思路，希望可以建立川陕甘三省根据地，甚至考虑派远征军占领新疆。

这些内容在行军过程中就不断发电报与红四方面军进行商讨。张国焘等人的回电对进入陕甘一直不置可否，反复强调北上的困难，认为西进青海新疆和南下成都平原是两种可行的选择。

随着会师的临近，这一分歧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于是，受中央红军之邀，张国焘一行于6月25日来到两河口，第二天，两河口会议召开。

会上首先是周恩来发言（算是代表中央红军的意思），讲了两点想法，一是认为红军需要迅速打击胡宗南部，占领松潘，以求北进向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二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要统一指挥，由军委集中领导。

张国焘发言。

从之前的往来电报中看，他本来是同意占领松潘的，但此时占领松潘就意味着要北上，而张国焘的观点是红军需要南下，占领茂县、邛崃、名山等地，最终占领成都，赤化全四川。



所以在会上他并没有表态同意进攻松潘，而开始强调甘南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原因是沿途敌军力量较强，且红军对甘南地区不熟悉难以建立长久的根据地。同时他表示，南下成都是完全可行的，以红军的兵力可以占领成都，并且成都平原物产丰富气候适宜，适合红军长久发展。

老毛当时也作了发言，向张国焘解释为什么要向北而不是向南，为什么川陕甘根据地可以建立而且是个好的选择等等。



会议开了三天，向南向北没有达成最终共识（虽然投票通过了文件），但最紧要的打松潘没什么异议，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各种战术细节，形成了《松潘战役计划》。

现在很多书籍或媒体评论张国焘南下一般是两点原因，一个是逃跑主义保存实力，不愿意和胡宗南部队交锋，一个是为了争权。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是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

张国焘争权这是事实，而且非常严重，但南下确实是他自己作出的战略判断，是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为了争权才提出的，也不能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后来分裂后，说中央红军北上逃跑主义，都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不仅仅是他，党内（尤其是四方面军内部）很多人也持有这种观点，说到底还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延续，并不真正认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四方面军之前就喊过“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大年”这一类的口号。

张国焘真正应该被批评的地方，在于其极度薄弱的组织观念和严重的军阀作风。简单来说，组织观念就是有什么事有什么意见在正规场合摆到明面上讨论，一经组织决定个人就要执行，若还有异议那也应该走正规程序公开讨论。张国焘则不然，组织决定的事他只要自己不同意就想办法不执行，而且为了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常搞非组织活动。

比如就在这两河口会议期间，他私下去找彭德怀聂荣臻。大家应该记得会理会议上中央出现过一些矛盾，张国焘也有所耳闻，以此为切入点挑拨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并赠给衣食进行拉拢。

没想到这可正撞到枪眼上了。会理会议上就是这样，林彪私下找彭德怀希望他和自己联名上书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彭德怀虽然拒绝了但没上报中央，因此后来引起了毛和其他领导对他的误会。身经百战的彭老总怎么会在同一个地方翻两次船，所以这一次张国焘刚走凳子还没凉，彭就立刻把情况上报中央。

毕竟是刚刚会师，中央也不好明说什么，但对他增加了一些警惕。



另一方面，本来松潘战役的计划是分兵三路并进拿下松潘，但会后回到驻地，张国焘并没有传达相关指令反而按兵不动，原因是认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

有关军委统一领导问题，两河口会议上已经通过决议，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很明显张国焘对此不满，四方面军人数是中央红军的接近 3 倍，这里又是他们建立的根据地，可军委中四方面军人员却不占优势。

会上不好反对，所以回到驻地后他一方面拖延一方面提出，要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徐向前为副总司令（总司令一直是朱德），陈昌浩为总政委（当时总政委是周恩来）。

中央当然不同意，同时再次询问按兵原因并催促。这时陈昌浩出面，说需要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当时的军委主席是朱德）并给军委独断的权力，朱德转任前敌总指挥，并强调“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还督促中央“速决速行”。

我们换个表述方式：

张国焘：不答应我条件我就不听军委指挥。

军委：条件是什么？

张国焘：以后军委听我指挥。

军委：我有一句……

**我有一句妈卖批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一定要讲**

中央紧急召开会议，这可咋办？要知道，张国焘嗜杀是出名的，早在鄂豫皖苏区就杀过中央派去的鄂豫皖特委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军长许继慎。到了川陕苏区他杀过的干部和群众超过 2 万人，甚至包括红四军军长兼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可以说，只要与他意见相左，无论官职大小党龄长短威望高低，都是一概格杀。

当然，更重要的是革命前途问题，第五次反“围剿”已经让红军损失惨重，如今好不容易会师，如果内部出现矛盾再次分裂，那对革命将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张闻天对权力一直并不热衷，说要不把自己的总书记让给他来做。

毛说这肯定不行，张国焘想要的是军权，总书记虽然党内地位最高但他不会满意。而且党内重要的会议都是由总书记主持，很多决议必须总书记签字，他要真当上这个还比较麻烦。

讨论了半天，周恩来提出让出自己的位置，让张国焘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大家基本认同这是当前能做出的做合理的选择了。（毛当时名义上的位置并不高，张国焘对他的位置根本看不上）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的合影

于是通知张国焘赶到芦花，7月18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就是“黑水芦花会议”。会上作出了这么几个决定。

首先是张国焘代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职务，包括“中央军委总负责者”。但鉴于其新任职务不熟悉，周恩来暂时留下帮助。

陈昌浩增补进入军委常委。

一四方面军部分混编后，重新设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可以看出，四方面军干部大量进入最高军事领导层。

第二天，又根据张国焘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这些年来的发展。其实这个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两军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表功会，张国焘希望通过这个增加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四方面军在我的手里一步一步发展得这么壮大，再看看你们中央红军……

所以张国焘虽然也说了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和发展中的问题，但主要一直在谈四方面军一直以来的成果。

四方面军同志发言结束后，由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发言评论。

他没想到中央红军内部风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平常在会议上的批评很多都是不留情面，这时面对其他军的同志虽有所收敛但也有一说一。

尤其是那个毛润之，简直过于耿直。其他人也都是主要谈功绩（四方面军功绩确实大，值得大书特书），然后再说些缺点和不足（比如周恩来批评的是张国焘虚假宣传方面的问题，为提高士气，一直向普通战士宣称中央红军有10万人，如今真正会师见到真相对士气和指挥员的威信都有影响），毛倒好，笼统地说一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开始讲问题。从鄂豫皖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从政治军事一直讲到经济问题，还附带分析，直接原因根本原因一大堆，最后赠送正确解决方法——当时你们本应该怎么做。

要不要这么耿直……

其实这一方面是毛一直以来的性格，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中央需要指出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会议开了两天，如果都在说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功绩，那么以后他提出的各种要求，四方面军干部大量进入中央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毛泽东



是最合适的人选：此时的他在中央红军内实际地位高，实际负责着最高军事决策，既对这个方面有深入研究说出来的话又有分量，但名义上他的党内地位却不到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位置，名义上并能不代表中央的观点，所以可以随便讲。

会议结束。虽然最后一天毛让张国焘不爽了一把但他的诸班要求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中央本以为张国焘会开始配合，没想到一回到驻地他再次拒不执行决议命令，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否则不会进军。



麻烦来了，本来拟定先打毛尔盖然后进军松潘，但现在一方面由于张国焘的不断拖延进军，一方面是行军途中恶劣的环境和守城军队的顽强，毛儿盖战役打了整整八天。

蒋介石已经亲临成都指挥，胡宗南的主力在松潘地区集结完毕，战机失去。

没办法，必须重新调整战略，8月4日，沙窝会议召开，张国焘与中央的第二次交锋开始了。

为了团结——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再次交锋

其实在前一天的8月3日，中央就已经制定通过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放弃进攻松潘，兵分两路北上夺取甘南地区，但是张国焘却从中一直阻挠。自从他代替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以后，就收缴了原来中央红军各部队的电报密码本，一切电报需要通过他才能递交到中央军委。另一方面，他又在四方面军内部开会，批判中央红军的政治路线是“机会主义”，并且否定遵义会议，称之为“调和主义”。

所以，沙窝会议一开始，张闻天代表中央红军这边发言，首先是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而后重申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决议，最后强调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再次强调，党指挥枪。

老毛补充，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并且采用了他的辩证哲学大法，分析出建立陕甘根据地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而南下或西进的困难是短时间内无法克服的。

而后，毛以朱毛会师为例，强调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

朱老总发言，支持建立陕甘根据地，强调一四方面军各有缺点，但都是优秀的军队，需要团结。

周恩来发言，提到张国焘这段时间对一方面军的批判有些过火，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整顿军队，但要注意时机场合，不能因此影响两军团结和当前战斗的胜利。并强调，要提升党中央在整个红军中的威信。



发现什么了么？每个人的发言都在强调一四方面军需要团结，可想而知当时两军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何种地步。更重要的是，“党指挥枪”这一条红军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发生了严重动摇，党中央的决定不一定管用了。



沙窝会议就是在这个破烂的小房子里召开的

中央红军领导人们讲话还算克制，只周恩来一人点了张国焘的名，也给他打了圆场“出发点是好的”，可张国焘的发言就没这么含蓄了。

他首先批评中央红军现在纪律松弛行军疲惫士气低下，必须要严肃看待抓紧整顿。

第二，他提出中央刚才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那些不支持他西进的人，这些人高估了在川藏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困难，一味逃避作战。

在发言中张国焘甚至明确质疑“为什么中央的政治路线就一定是对的”。——毛主席后来说当时张国焘是“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

陈昌浩旗帜鲜明支持张国焘，并且把张说了一半的话补充完整——“一方面军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一方面军）干部不负责任”，“应做专门决议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

双方你来我往，吵得很凶，最后形成和稀泥状态——需要整顿，但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影响团结；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下去以后需要多讨论。由于当时中央委员中中央红军领导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北上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最终还是通过了。

但是，这一摊稀泥能和起来，是因为它真的很稀，并不涉及张国焘的核心利益和长远打算，下面要和的，可是一滩水泥。

张国焘提出，要多提拔工农干部，然后提出要增加四方面军 9 个人进政治局。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加上张国焘一共才 8 个人，你这意图也太明显了吧。

（当然，张国焘晚年在其自传中说，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党内民主，并没有其他任何意思，而“军事独裁者”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他）

中央其他人当然不同意，激烈的争论后还是做出让步。陈昌浩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周纯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周纯泉、徐向前三人。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傅钟三人。



张国焘仍然不同意，继续争论。

毛说，政治局会议直接决定这些人事安排已经不合规定，考虑两军合并和战事紧迫的特殊时期才这么做。（你不要太过分）

张国焘说，我们四方面军近来发展这么好，很多领导人能力很强，应该让他们参与决策，更好地发挥军事民主。（你不同意就是不民主）

毛说，是啊，这个提议好。红军现在缺干部，他们能力强，正好可以安排到其他部门做事。（呵呵，和我玩文字游戏）

张国焘一看文字上玩不过毛诗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就是想要让他们进政治局。（我扳手呢？）



没办法，此时的毛周等人再次让步，周纯泉由候补委员变为政治局委员。

另外，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泉为副主任。

张国焘同意。

沙窝会议结束。

你以为这就真正结束了？

Too young。

张国焘一回到驻地就秘密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反对中央北上计划，并提出西进青海方向的“出阿坝计划”。

厉害啊！“反复无常”这个词简直就是上天专门为张国焘准备的。

中央红军这边，周总理又病倒了。

前面讲过，过雪山时周总理把自己的担架坐骑都让给伤员，下山后即开始咳嗽。但是外有战事内有矛盾，他作为红军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一刻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反而经常需要熬夜处理大量突发事件。

这连续三天的沙窝会议，终于让他心力交瘁，高烧 39.5℃，昏迷不能进食。阿米巴痢疾、肝脓肿，医生后来的回忆是“垂危状态”¹。

形势好严峻。

此时的红军的配置并不是原先那样一四方面军单独行动，而是为了两军团结，混合编制成左右路军分头行动。



长征中的周恩来

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周纯泉等为主要领导人，四方面军主导，会议结束后驻扎在卓克基，目标进攻阿坝。

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毛周彭等朱德外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这里，驻扎在毛儿盖准备进攻班佑。但是直接的军事指挥权却归前敌指挥部，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最终负责。另外，人事安排上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笔，维持叶剑英的前敌指挥部参谋长，这个决定在不久之后将要挽救周、毛，挽救红军。

本来当时拟定作战计划为，张国焘的左路军主攻阿坝，右路军配合左路军行动，占领班佑包座之后佯攻松潘吸引敌主力，而后红军占领阿坝进行物资补充休整，再向东进攻开辟甘南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的“出阿坝计划”走漏了风声，为中央所知晓，原来张国焘占领阿坝是为了他之后西进找据点。

另一方面，敌情发生变化，殿后部队与刘文辉等部交战不利，而右路军的军事行动比较顺利，这时集中兵力从东部直接突破就成了更好的选择。

于是 8 月 15 日，中央致电张国焘，说明计划之改变，左路军主力应当迅速向右

¹ 据杨尚昆回忆，周总理在长征期间既要行军又要抓紧时间工作，非常辛劳，常常在马背上就能睡着。后来觉得太危险，就放弃骑马多步行来消除困意。



路军靠拢，直接向东进军夏河流域，可以派一支队佯攻阿坝殿后。



陈昌浩徐向前也是十分赞同这一计划的，前敌指挥部于8月18日向张国焘致电说明具体军事计划。

8月19日张国焘回电，同意向右路军集中而后东进，但同时强调阿坝是必须要打下来的，那里财粮丰富，可以给红军很大的补充，还能留条后路。

中央这边已经隐隐感到，张国焘可能要把事情闹大。

于是，在沙窝的政治局常委们召开会议，王稼祥提出，是时候同张国焘斗争了。

毛不同意，现在军事战斗压力大，还不是直接开展党内斗争的时候，能团结则团结，可以不点名指姓地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评。

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将来的战略计划。大家知道，毛在军事指挥时一向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这次也一样，说不定前线真有什么特殊情况必须打下阿坝。因此对于左路军提出的“必须占领阿坝”并未反驳，而是强调，阿坝可以迅速打一下，但是后续部队不要经过，主力要迅速向东靠拢，向东开辟根据地。

同时大家也做好了张国焘不来会和的准备。本来右路军人手不够，单独出击打包座、班佑并没有十足把握，一直就希望左路军抽调一部分部队支援，但张国焘一直找借口不同意。所以这次决议仅仅把左路军定位为下一步战斗行动的“预备队”。

除了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病重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参与讨论。所有人，包括陈昌浩、徐向前这两位四方面军领导，都赞同毛的发言，向东而不要



向西。

21日，左路军攻占阿坝。

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中央决议，希望左路军能够迅速东进，争取两军会合在洮河流域与敌军展开决战。

同日，右路军开拔，踏上了茫茫草地，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

更大的风波要来了。

尖峰时刻——长征最后两月的斗争

红军长征面临无数困难，除了对外的军事斗争、内部的政治斗争外，每天还要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云贵的山路、川藏的雪山，还有一条又一条湍急的大河。但是综合来看，二万五千里路上严苛的自然挑战还是来自草地。



电视剧《长征》剧照，比较真实的还原

关于红军过草地，有太多的文学和史学著作。大家应该还记得小学时候的课文《倔强的小红军》，一个小红军为了不让其他战士担心，往本来干瘪的干粮袋里装上牛膝骨，拒绝了陈赓大将的帮助，最终倒在草地上。

其实饥饿只是困难的一部分。这所谓的“草地”并不是北方的草原，而是高原上一片巨大的湿地。这里处处是沼泽，必须结伴一起沿着草甸行进，稍不留神踏入泥沼就会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

5-9月为草地的雨季，当时正值8月末9月初，红军晚上露营根本找不到干的地方，就铺个东西往这湿漉漉的地面上躺下或相互靠着休息，有时候天气恶劣风雨交加，也只能这么干淋着。

过草地需要一周时间，战士们饿死、冻死、累死、病死、淹死、（吃毒草）毒死，几路红军非战斗减员超过一万人。

8月27日-29日，右路军陆续到达班佑，大家再次看到熟悉的田地、炊烟——终于走出草地了。



然而并没有时间休息和庆祝。红军要想到达甘南，就必须通过前方的包座。包座地势险要守备严密，且胡宗南已然得到消息，派兵向包座增援。

我们之前讲到过，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导，毛周张等人为领导，但四方面军的第四军（许世友）和三十军（程世才）也属于右路军，且前敌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徐向前陈昌浩。

前敌指挥部率先到达班佑后就着手研究进攻包座的问题，徐向前认为中央红军人困马乏，且装备也不及四方面军，因此建议由四方面军部分负责进攻包座。

最终，包座战斗从 29 日打到 9 月 1 日，共击毙敌军两千余人，俘获近一千人，并得到大量物资，成为长征过程中最大的一场胜利。

可惜并非所有人都是徐向前这样的真-共产主义战士。

包座战斗结束后，中央联名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张国焘督促其迅速通过草地实现两军会合。

当时左路军已经进入草地两天，陆续来到葛曲河畔。张国焘回电说，草地环境太恶劣，没带够粮食，不想过了。

中央回电，早想到这一点了，已经派一个团带着粮食出发接应。

回电，葛曲河水太深了，过不去，准备退回阿坝。

朱德也在军中，他觉得不对了，和警卫员赶到河边试水。虽然当天暴雨河水上涨，但此处为黄河上游支流，涨得快落得也快，只需稍作等待就完全可以渡过。而且此时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了葛曲河，并没有任何问题。

张国焘不听劝告，依然下令三天之内左路军全部撤回阿坝，包括已经渡过葛曲河的部队。

这个……不是说河水太深过不去么？怎么可以回来？

无可奉告。

徐向前陈昌浩心想这个不成，我二人已经在中央表过态支持北上，红军本来就力量弱小，这一分开很容易被分别消灭。急忙给张国焘电报，说明目前紧张的局势万万不可分兵。

但毕竟二人是张的老部下，尤其陈昌浩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对军事了解不够，北上并不完全坚定。所以发给张国焘的回电里加了一句，北上上策南下下策，只有万不得已才用下策，希望你明天和中央（老毛他们）好好商量。



好，要的就是这个万不得已。

张国焘立刻回电了，很好，你们准备准备，带着右路军南下，草地冷，皮衣准备好了没有哇？（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陈昌浩于是给中央电报（虽然都是右路军，但徐陈二人在潘州的前委指挥部，毛张等人则在巴西），说，咱准备南下呗。

毛、张（闻天）等人看到后——WTF？！！我们啥时候同意南下了？！！

急忙给前委回电询问情况。徐陈二人表示，我们也不知情啊，以为你们商量过。

当晚，右路军七位主要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赶到周恩来休养的牙弄召开紧急会议。

中央红军的五位当然强调要北上，问徐陈二人意见。

陈昌浩打了个太极：

南下有南下的困难，北上也有北上的障碍。一个要再过一次环境恶劣的草地，一个是前方围追堵截的敌军。我建议是尽量两军一道北上，毕竟敌军还未完全到位；但是如果张国焘一定要我回去，那我也听他的南下。

（真-官场老油子）

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分析，应当两军一道北上。但如果张国焘一定要求南下，他没考虑好，因为可能会造成红军的分裂。

于是，七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电报，从军事、经济角度陈述厉害，劝说他立即北上。

可张国焘去意已决，连发两封电报。

第一封

上文说到过，左路军有一部分军队渡过了葛曲河，张命令其南下退回阿坝。可有一支人马，原中央红军蔡树藩率领的军委纵队并未听令（没有电报，也有可能是未联系上），反而继续北上。

这就麻烦了，一旦他们和右路军汇合，“葛曲河涨水”这一拒绝北上的理由就无法成立，将来假如真的分裂，若与毛周等人争论正统性，道理上就落了下风。

张国焘电令驻扎于阿坝的部队，马上派人追上军委纵队，命令他们南下到阿坝卓克基汇合，如果蔡树藩等听令回来，则立刻将其扣留，到时候告你们如何处置。



（原件：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第二封

这第二封电报直接发给了陈昌浩。

电报原件如今已然不知去向，具体内容究竟如何一向争议颇多，比如究竟有没有提可以“武力解决”等。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要求陈昌浩和徐向前带领四方面军人马立即南下（而不是上一封的“准备南下”）；二是，电报措辞十分严厉，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历史的天平偏向了中央红军。

当译电员急匆匆地拿着电报找陈昌浩时，前敌指挥部正在开会，而陈则在情绪激动地发言。

译电员看了看，现在给他不合适，就把电报交给了旁边的叶剑英——虽然电报写着给陈昌浩，但叶是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长，按规定可以阅读。

叶帅眼睛一扫，惊出一身冷汗。

但他面不改色，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听陈昌浩激昂的讲话，过了一会儿，借故（应该是上厕所）悄悄退了出去。

叶帅找到自己的马，飞奔向3里之外的中央驻地。

中央当晚没有会议，叶帅于是直接找到老毛住所拿出电报。

毛看到后也吃了一惊，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早就想到的，可没想到他这样坚决，动作这样快。

来不及找纸笔，老毛随手拿起铅笔头和卷烟纸匆匆记下电报内容，嘱咐叶剑英赶紧回去，莫要让陈昌浩起疑心。

当叶帅赶回前委会议处，陈昌浩竟然还在讲话，叶帅顺势说刚接到电报，交给陈。这封只希望陈昌浩一个人看到的电报，其实已经被叶、毛、张（闻天）、博（古）四个人看过了。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讽刺党内许多干部，写文章、作报告空话连篇又空又长，不知那时的陈昌浩看后作何感想，是否会想起七年前的一个寒冷秋夜，自己在喇嘛庙里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送走叶剑英的老毛立刻找到张闻天和博古，三人赶到七里多外的红三军团驻地，



周恩来和王稼祥在这里养病。

五人短暂商议后，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必须立即脱离四方面军北上。

红三军团的司令一直是彭德怀。战争年代，党每每陷入险境，彭大将军总能立下汗马功劳，这次也不例外。

张国焘做总政委后，即收缴了各军团直接联络用的密码本，规定所有电报必须通过前敌委员会电台转发，而前委是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这意味着，只要张国焘需要，他可以控制各部队之间所有通讯。

近几日张国焘与中央反复争论南下北上问题，彭总虽未参与讨论却也早有耳闻，又发现陈徐的四方面军部队到处筹粮备衣，似乎在准备南下过草地。

中央驻地与前敌指挥部近而与红三军团远，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更是已经到了前方的俄界，中央没有任何保护。

彭总一生多打恶仗，凡事往最坏考虑。他一直派十一团在中央驻地附近秘密警戒，又派人携带电台和新密码找到红一军团方便直接联系。

没想到这密码刚一送到，事情就出了。

毛周等通过彭德怀这里告知林聂，停止前进在俄界等待接应，中央及红三军团马上出发与其汇合。

趁着夜色，红三军团悄悄开拔，由周恩来带人殿后并设置警戒。

我们把视角回到叶帅那边，他将持续之前的演技爆发，闪耀今晚的夜空。



长征中的徐向前（左）与叶剑英（右）

叶帅自己走容易，但他还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将原属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队的同志们带走。会议开完已经深夜，这么一批人突然离开，不可能不惊动其他人，怎么办呢？

叶帅打算拿电报内容做文章。

他找到徐陈二人说，总政委要求咱们迅速南下，可过草地的粮食还远没有准备好，所以直属队希望可以打粮食，今夜两点出发。二人同意。

而后，叶帅召集直属队几位主要领导开会（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等），告诉他们情况，绝对保密，互相对表，务必在两点整集合。



叶帅又以打粮为名，借走了全军唯一一份军用地图藏在床下——他和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睡在一间房里。

回到房中，叶帅一直不敢入睡，直到一点四十五，悄悄起来穿上衣服，拿出地图装好，走出房门找到隔壁的肖向荣准备一起出发。

突然，叶帅发现贴身手枪没带。肖向荣建议赶紧离开，万一回去惊醒陈昌浩就不好办了。叶帅想了想，自己出来是巡视打粮队伍，没毛病，即使碰到他二人醒来也没事；可如果他二人半夜醒来发现叶人走了枪没带，可能立刻就会起疑心。所以还是悄声回去拿上枪，这才和其他人一道离开前委驻扎的潘州村，北上追赶毛泽东和红三军团。

第二天一早，徐陈等人就发现，叶剑英不见了，而且绝不像是去打粮，军中唯一一份军用地图也没了。

接着，外围的部队打来电话，中央红军的人已经不见了，往北而去，还对这边放了警戒哨，我们打不打？

陈昌浩接的电话，他转头看着徐向前问他怎么办。

徐赶紧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就这样，毛周等率领的中央红军于9月11日到达俄界，与林聂的红一军团汇合。

毛周等深知，红军的分裂已经是难以挽回的了，而除了这几位最核心领导人外，其他将士们大都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此时最紧要的就是对内稳定军心，对四方面军那边，声明自身的合法性。

于是，9月12日，俄界会议召开，陈述了自两军会合以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与造成的不良后果，将其定性为“军阀作风”“机会主义”；整编目前带来的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9月16日，红军来到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要，大概有一个营的敌人，无法携带重武器进攻（也没有），红军就投以海量的手榴弹。

没想到敌军投以双倍海量的手榴弹，再加上碉堡的防守加成，轻轻松松抵挡了整个白天。

入夜，红军发挥一贯特长，不断骚扰，守备敌军根本睡不好觉。

黎明时分，敌军已然又困又累，一队红军成功从山路迂回到后方，前后夹击，这才拿下腊子口，长征路上最后一个难关被攻克了。

第二天，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并带回许多报纸。



腊子口至今仍存在大量碉堡和文革时期的标语

早在四川的时候，毛周等人就从报纸上得知陕甘地区还有一只红军队伍，但具体情况并不明了。靠近陕西后老毛一直指示队伍尽可能地搜寻当地报纸，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这支队伍现在还在不在？具体位置在哪里？

终于，侦察连从哈达铺找到大量《大公报》，有一则消息是这么写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西省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长征的终点终于确定，红军再次踏上征程。

10月7日早上，老毛亲自指挥红军在青石嘴打了一场胜仗，歼灭敌军两个骑兵团，缴获大量物资和上百匹战马。

下午，翻越六盘山。

抬头只见天高云淡飞雁南翔，俯瞰红旗猎猎队伍规整，群山万壑皆在脚下，老毛回首走过的关隘山川——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大渡桥横腊子口险，从江西出发至今不知不觉已然过去整整一年。

他感慨颇多，不由得吟出一首《长征谣》，后来改写成《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一方面军长征至此结束。

就这短短的半个月內，毛还有其他不少名作传世。比如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毛提到：

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

还有一首著名的《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大家回想他在江西时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分析思路一样，无论在哪里，毛的眼界始终着眼于世界革命，始终在分析世界上不同势力、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联系互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长征的磨砺让他更加强大。

每一位经受长征洗礼锤炼的红军都是这样的巨人。

巨人们即将缓缓站起，显露出伟岸的身躯。



（全文完）



说明：

1.本文开坑于 2015 年 12 月，起初仅仅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红军一直由毛泽东领导，在江西的最后两次围剿，会被粉碎不？会不会就没有长征了？”后来在读者的滋磁下一直写到长征结束。由于知乎答题字数限制与图片上传限制，本文后半部分转战微信公众号进行分章节更新，于今年 2 月 12 日更新完毕。

六万字写了一年零两个月，比中央红军长征时间都长。不同之处在于，长征一年体现出的是红军顽强的意志，我这一年体现出的是自己顽强的拖延症。

2.长征期间环境恶劣，资料遗失比较多，许多问题学界至今都有争议（如密电、三人团等）。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因此在写作中仅选取自己最认可的研究成果进行叙述而不做学术讨论。

如果大家对本文的叙述不认可，欢迎来信讨论。

3.本文免费下载免费传播，非商业用途转载注明出处即可。
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够把文章推荐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历史的细节。

3.本岛主其他文章可以在知乎或微信公众号查看。

知乎 ID：通吃岛岛主

公众号名称：通吃岛，ID：tongchidao123



一点微小的贡献，谢谢大家！